



汉口亨达利创办于1922年，以经销、精修钟表传世，2021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新洲城楼寨茶据传始于清初，入选第七届世界军运会茶叶专供商，2021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2022年第6期(总第356期)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周晓琦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朱向梅 李定君

董 菲 杨 华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李运玲 杨 萌

张智勇 陈胜利 林 伟 陈红英

徐 莉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严 濂

编 辑：许 濛 郑雅飞

特 约 编 辑：华 蕾 张川蕾

游 迎

封 面 设 计：王 鹏

老字号脉

4 汉口亨达利的百年时光 / 潘曾琦(口述) 方三勤(整理)

8 城楼寨茶走进世界军运会 / 王 飞

九城同心

12 孝感历史文化简介 / 胡绍翔 黄念军

14 一剪神韵夺天工 / 周 芳

19 老澠河“新生记” / 董晓芳

三镇拾遗

25 武汉解放时一份通告的两个版本 / 田联申

28 我与“贱三爷”的不解之缘 / 沈远义(口述) 宋 艳(整理)

委员天地

32 让每一份提案都掷地有声 / 程 祯(口述) 郑雅飞(整理)

35 乡村振兴路上的“她力量” / 李荏苒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 39 我的人生格言是专注和创新
/ 常发文（口述） 田 勇（整理）
- 42 匠心营造 智慧生活 / 王升洪（口述） 严 濂（整理）

往事漫忆

- 46 武汉民盟建言组建新江汉大学
/ 郭友中（口述） 宋 薇（整理）

山有黄门

- 49 在章开沅先生身边十七年 / 刘家峰

人物春秋

- 54 《墙头马上》的台前幕后 / 俞启凤

史海钩沉

- 57 从汉口电工器材厂到长江电源厂 / 方 宏
- 62 “顺丰茶栈”与顺丰砖茶厂关联考 / 韩少斌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汉口亨达利的百年时光

◇ 潘曾琦（口述） 方三勤（整理）

漫步中山大道，水塔附近的一家西式门楼上，悬挂有一面直径两米的大圆钟，十分惹人注目。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汉口亨达利。

大钟是 1922 年挂上去的，一挂就是整整一百年，见证了汉口码头的风起云涌和亨达利自身的兴衰变化，闪烁着历久弥新的光辉。

2018 年，在亨达利即将开启第二个百年的时候，我荣幸担任了武汉亨达利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充满传奇的老字号钟表店，承载了几代钟表人的上下求索，培育了一批“钟”其一生的能工巧匠。我希望用我的满腔热情和一片赤诚，让亨达利的“武汉时间”与城市的时代脉搏同频，每分每秒都鸣奏新的乐章。

上海美华利学徒“跑街”起家

19 世纪中叶，西欧日耳曼人实现了钟表业由粗码向细码的跨越，手表逐渐风靡世界。

亨达利，作为一家名表经销商品牌，自鸦片战争起，由德商霍普兄弟最早引入中国上海，其英文牌名“HOPE BROTHERS WATCH CO.”，即霍普兄弟钟表公司，主营中高档进口表，在上海滩颇有名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向德国宣战，德商被迫离沪回国。这一时期，上海一家本土钟表店生意兴隆，它便是宁波人孙延源开办的美华利。此后，孙梅堂子承父业，辗转接手德商留下的亨达利，一下掌管“两利”

（亨达利和美华利），大力发展业务，分号遍布全国。旗下钟表厂生产的时钟，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金质奖章，孙梅堂因此誉为“钟表大王”。

1910年，在上海美华利当过学徒的浙江人陈文生来到汉口，在德商礼和洋行经营的太平洋表行当“跑街”。所谓“跑街”，就是代洋行接洽商号、推广营业，以获取佣金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宣战，德商撤走前将招牌卖给了陈文生。1915年，陈文生在汉口四官殿开设了敏记亨达利钟表行。

陈文生天资聪颖、勤奋好钻，逐渐掌握钟表经营的业务，加上管理严谨、经营有方，很快发迹。1922年，他用3000两银子，租下中山大道兴业银行的铺面，开设了亨达利钟表店，并与上海亨达利总行联号经营，全面经销与精修世界名表，汉口亨达利自此诞生。

同年，陈文生喜添贵子陈芝章，朋友们特意从德国定制一面大圆钟作为贺礼。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机械钟，上一次发条，可准时走七天，故名“七天行”大门钟。

大门钟悬挂上钟表店的门口，成为亨达利的象征。

亨达利经营欧美各国钟表，与上海亨达利、三五钟厂、香港华明行、宝亨行等名厂名店，长期保持进货关系。到日军入侵武汉前，每月营业额平均3万余元，销售以门市零售为主，还为客户定制安装各种门楼大钟，维修钟表以技术精细而享有盛誉。

陈文生头脑敏锐，在经营中注重打造



亨达利“七天行”大门钟

品牌。他向瑞士HOPE厂定制金银质豪华怀表，向德商谦信洋行定制“双箭”马头钟，并在这些钟表上加刻“亨达利”标记，再以高出同类商品25%的价格销售。即使销售上海总行提供的钟表，也要刻上“亨达利”和“美华利”商标。

安装江汉关大钟名传三镇

1922年一经开业，亨达利很快成为武汉家喻户晓的钟表名店，不仅销售的钟表质量可靠，而且维修技术也属一流。

1924年，武汉海关江汉关大楼的大钟，由亨达利承接机械安装，当大钟准时敲响，亨达利的名声也随之响彻三镇。从负责安装



全国劳模唐家星在维修手表

大钟的老一辈修表匠人王亨亮开始，亨达利便以精工修表技艺传世。

亨达利秉承“校验严格、保证质量、精工修理”的理念，所有手表上柜前必先进行校对，走不准概不上柜，且聘有技艺高超的修表技师负责售后服务。

在亨达利，每个师傅都要先过“三关”，那就是“钻、锉、盘”。

“钻”——就是手表的表轴折断后，在表轴上钻孔，然后再将轴插进去，造出一个新轴。有时表轴像头发丝一样细，为了钻孔，还得用钢针制作钻头。

“锉”——就是将零件锉方锉圆，方要方得周正，圆要圆得润滑。

“盘”——就是盘游丝，有时没有同型号手表的游丝，还要自己制作。

因为修表难学，大多为世代传承。

1938年陈文生病逝，两家店由两个儿子分别继承，长子陈芝章为“敏

记亨达利”，即现在的中山大道店；次子陈又章为“又记亨达利”，即现在的江汉路店。

武汉沦陷后，“又记”迁往胜利街，业务大不如前，抗战胜利后迁回江汉路28号重新开业。“敏记”迁入车站路，1945年陈芝章用30两黄金赎回中山大道门面，迁回原址继续经营。陈芝章重视“两信”（对内讲信任、对外讲信用），聘请高级技师王明镜辅佐，重点抓技术维修，重振亨达利声誉。

全国51家共享“百年名标”

新中国成立，迎来新发展，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亨达利改名“新时代钟表店”。新时代发扬老传统，始终坚持“以卖带修”的特色，信誉、质量、维修技艺不断提高。1963年，全省第一位钟表修理工人工程师唐家星，就是从亨达利走出。后来，唐家星还成为全国劳模，受到毛主席接见。

由于亨达利精工修理建立的良好信誉，修理部的门前，经常出现顾客排队修表的景象，一度不得不采取预发号限额维修。



1964年唐家星获商业部颁发的修理钟表工人工程师证书（唐武平收藏）

1981年恢复“亨达利钟表店”，1984年改名“武汉市亨达利钟表眼镜公司”。1985年，武汉亨达利已成为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全国“两亨”（亨达利、亨得利）钟表分会的副理事长单位。

2001年3月8日，象征亨达利的大圆钟再次在店门口悬挂。10月18日，中国商业企业协会以全国“两亨”钟表分会的名义，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服务商标，51家会员单位共享这一“百年名标”。

2002年，经改制成立武汉市亨达利钟表眼镜有限公司，2011年认定为“武汉老字号”。2012年8月，亨达利新增“名表品鉴屋”，拓宽业务范围。

为延续钟表生命奉献匠心

2018年，亨达利由于资金困难和经营模式不适等问题，寻求新的传承人时，我接手担任公司总经理。着眼于新气象，将店面进行装修和重新布局，有10来位技师为顾客服务，其中3人为国家级技师。

为传承历史留驻经典，重振百年老字号，专门成立以奢侈品牌手表为主的二手手表交易中心，将具有保值增值和收藏功能的世界名表进行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名表的价值效应。

此外，亨达利几十年修理的手表中，因各种原因逾期未取，竟达300块之多。这些手表大多为“上海”“武汉”等国产产品，也有部分是日本“西铁城”、瑞士“英纳格”等进口货。手表上系着收据存根，有的已经泛黄，有的字迹模糊。

亨达利替顾客着想，一直没有随意处置这些手表，而是存放在十多个专用铁柜里保管，名贵手表还用专用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



亨达利逾期近30年未领的英纳格手表，依旧可以凭发票领取

实。“上辈人立下的规矩，下辈人也不会动。只要一天找不到表主人，亨达利就会一直守候下去。”由此，我打算在店内设一个手表博物馆，将这些手表展示出来，静待顾客或后人前来认领，续写亨达利的传奇。

在我们城市，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钟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计时工具，同时也被钟表文化蕴藏的丰富内涵所折服。我希望亨达利的手表博物馆，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钟表“滴答”行走的背后，有这么一批人，默默坚守着、呵护着、延续着钟表的生命，以匠心为之奉献一生。

目前，亨达利是我国最大规模的钟表零售企业，曾有“汇世界名表于一店，集精湛技术为一堂”的辉煌，我将努力秉承“品质求精，永无止境”的经营理念，励精图治，继往开来。

潘曾琦，武汉市亨达利钟表眼镜有限公司总经理；方三勤，武汉市江汉区民政局二级调研员

城楼寨茶走进世界军运会

◇ 王 飞

“接力传承，创新发展”——这是城楼寨茶对初心的坚守，昭示着这家老字号历经 160 年传承创新，已成为武汉高品质有机茶及地理标志产品茶的代表。

接力传承创基业

城楼寨位于巍巍大别山余脉，海拔 345 米，山势蜿蜒，层峦复涧，秀谷相迭，生态旅游公路贯通全境。

清初为避战乱，新洲旧街胡贤大湾的开明绅士胡百万，开始在城楼寨山上种茶、制茶。寨内有一座龙王庙，庙内有一口龙井，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清甜可口。以此水泡茶滋味醇厚，止渴生津，齿颊留香，润喉回甘，有“久泡不变红，久放不变质”之称，名曰“城楼寨茶”。至今在古城石寨的遗址上，仍保留着那时种植的 20 亩老茶园。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1951 年为解决

生计，由姚河村等牵头，在城楼寨建起“烟李湾林场”，加工城楼寨茶叶。林场第一任书记邵启山、厂长胡仲山组织大家按传统手工制茶方法，制作卷曲形茶。但因大集体模式，农户看重水稻、棉花等农作物，茶园逐渐荒废，城楼寨茶濒临消失。

1970 年 7 月，新洲县农业局特产股恢复茶叶生产。1978 年茶园从烟李湾林场分出，成立旧街城楼寨茶厂，1982 年划归旧街镇经管站管理，属集体企业，由戴新咏任厂长、胡年才为副厂长。

戴新咏向烟李湾林场老厂长取经，恢复城楼寨茶传统手工制茶工艺，把土砖房改建成青砖房、扩建实生茶园 150 亩。他在黄冈地区农业培训班学习后，按照专家意见，把低产老茶园全部台刈改造，被区公所领导误解，以破坏集体财产之名关了起来，差点闹出笑话。胡年才一边传承传统手工制茶技术，一边引进机械加工茶叶，仿西湖龙井的



2019 年湖北广播电视台“江城非遗坊”播放画面

制作方法，定型手工制作扁形“碧峰茶”，应市后在武汉有了较大名气。

此间，茶厂仍以手工传统制法为主，固定职工 50 人，高峰时 30 人一字排开手工炒茶，场面十分壮观。男女相互学习，师徒手手相传，先后培养手工技师 70 人左右，全面掌握茶叶种植、加工技艺的高手不断涌现。除了戴新咏、胡年才两位厂领导，高手的代表人物有黄桃菊、王真梅、王双富、宋资科等。周边姚河、大雾山、团上、杨山、楼寨、九岗、石河、石咀等 8 个村及农户开始大面积种茶。

改制转型求生路

1990 年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镇集体企业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城楼寨茶更是生存困难，原 50 多号员工纷纷离开外出谋生，茶园面临倒闭，不得不进行企业改制。

2000 年，武昌人杨柏超在一次土地拍

卖会上，通过拍买流转，取得城楼寨茶厂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茶厂进入现代化生产经营时期。

杨柏超引进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按照生态、有机茶方向发展，新建加工厂房，引进绿茶机械加工设备，产品 2004 年通过“中国农产品质量认证中心”（杭州中农质量认证中心）有机茶认证，成为武汉市首家通过认证的企业。

茶厂从 2000 年开始生产无公害茶叶，2001 年由中国国际贸易会和法国科技技术监督评价委员会授予“中国高质量产品”称号。“城楼寨茶”2007 年取得 QS 认证，并成为市级农业科技入户核心示范户。2008 年步入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2009 年，我的父亲王双富从杨柏超手中买断经营，大力进行茶园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扩建茶园及厂房。他坚持质量就是生命、就是效益的理念，坚持绿色生态发展，建立完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新建富城农庄、天香茶苑汽车野营基地，恢复传统手工



城楼寨茶亲子采摘活动

制茶技术，使城楼寨茶地理标志产品制作工艺，列入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1年，“城楼寨”商标获湖北省著名商标，茶厂跻身武汉老字号行列，先后斩获湖北省“陆羽杯”金奖、全国名优农产品、中国（上海）国际茶业博览会金奖等荣誉。

几年来，父亲坚持与时俱进，接力经营，传承技艺，发扬光大老字号的文化底蕴，擦亮了“城楼寨茶”金字招牌。

茶旅融合开新篇

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父亲在茶厂工作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

我还来不及悲痛，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就接手了茶厂运营。我虽然年轻，缺乏经营管理经验，但坚强有担当，深深知道：城楼寨有红色之根、绿色之秀、古色之韵、新村之美，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天时、地利、人和”相得益彰。城楼寨茶独具特色，滋味醇爽，汤色明亮，口感特佳，又耐冲泡耐贮藏，这块牌子不能丢。

我在短时间迅速进入角色，

积极开创“茶旅融合”发展之路——把红色旅游与绿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打造生态旅游景地；把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打造修身养性场所；把休闲旅游与健康养生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天人合一平台。

基于这样的思路，以东部生态旅游线路为红色主线，以城楼寨茶茶园等大自然景观为依托，以山、水、林资源为载体。着重开发自然景观、娱乐休闲、山野食宿等，让人们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领会一个“农”字，享受一个“闲”字，体会一个“养”字，感受一个“静”字，品尝一个“绿”字。

为此，建设了城楼寨古战场、观光生态茶园、生态立体种植园、观景探奇野营基地、农事体验有机茶叶蔬菜基地、科普教育农园，改建了富城山庄的休闲设施（生态养生餐饮酒店与生态商务休闲），2021年成功创建省级农业休闲示范基地。

2019年通过层层选拔检测，城楼寨茶与武汉光明茶厂、龙一茶厂等5家同打“黄鹤楼”品牌，参加黄家湖军运村“武汉老字号专区品牌展示”，被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确定为茶叶供应商，知名度再一次得到提升。



城楼寨茶汽车露营活动

迎风起舞，再接再厉，我提出非遗传承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模式，探索“非遗+旅游+园区”保护开发的路子。非遗与旅游景区、产业园区、研学游、茶文化等，积极构建融合产业链模式运营。加强非遗传习基地建设，修建名茶展示厅、茶体验园、品茶阁、茶文化走廊等，举办茶文艺演出、中秋诗词知识竞赛、露营活动等，组织文化遗产展览、展示、展演，利用融媒体大力宣传推介，有效提升了景区的文化内涵，实现了传承人项目和新洲区非遗事业的共赢。

放眼四望，目前已建优质茶园 1200 亩，其中投产 800 亩；茶叶加工区 20 亩，加工厂 1800 平方米，加工精制设备 30 台套，年生产茶叶 40 余吨，其中名优有机茶产量 32 吨，年产值 4100 余万元。

2018 年底，茶厂与李集镇贫困村刘溪村签订 100 亩黄金茶基地协议，种植优质黄金茶、黄金芽、奶白茶，全部安装自动喷灌设施，因而经受住了 2019 年大旱的考验，保证了 90% 以上的存活率。

茶厂注重种植、生产、加工、销售、质量等各个环节的管理，着力打造“生态茶、健康茶、放心茶”口碑。在茶厂带动下，周边农户开始种茶，产品价格也随着品质不断上升。绿茶由每 500 克不到 200 元提高到 600—800 元，茶农的鲜叶每 500 克由 20 元提高到 40—60 元。白茶由每 500 克 800 元提高到 1200—1800 元，茶农的鲜叶由每 500 克 80 元提高到 100—120 元。农户的农作物年收入，由 8000 余元提高到 21000 余元。

茶厂季节用工 300 余人，人均收入 4000 余元，年发放工资 120 多万元。固定工人 35 人，人均月工资 5100 余元，发放工资 180 余万元，缓解了山区人民就业难的问题。



2019 年城楼寨茶走进世界军运会

目前，茶厂辐射带动周边村发展茶叶生产基地 4000 亩，联接农户 300 余户，调动了茶农的积极性，基地农户每亩茶叶年收入达到 5000 多元，产生了非遗资源带动乡村周边文旅及相关产业增长的良好效应。同时，搭建“产学研销”链条体系，创建了省级休闲示范园区 1 个、市区级问津茶苑产业园区 1 个、大学生创业就业基地 2 个，接待省内外中小學生 10 万余人次，带动了 5000 多人就业。

王飞，新洲区旧街城楼寨茶厂总经理

◇ 胡绍翔 黄念军



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距今 10 余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孝感就有人类生活痕迹。先后发掘出的陶家湖、叶家庙、门板湾这 3 座距今五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堪称孝感的城市之根。其中，门板湾遗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列入“20 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1975 年 12 月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 1100 多枚竹简，为我们研究战国晚期和秦朝历史文化提供了翔

实的资料。孝感也是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460多处古遗址历经数千年时光流转，向人们讲述鸾翔凤集的辉煌历史。

红色文化熠熠生辉。土地革命时期，孝感是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贺龙、徐向前指挥红军在此进行过龙王集、双桥镇等著名战斗。抗战时期，陶铸在应城汤池举办培训班，培育了大批抗日骨干；李先念在安陆彭家祠堂宣布建立新四军第五师，孝感成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五师长期的领导指挥中心。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大悟宣化店同美蒋代表谈判，揭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李先念率领中原主力部队展开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孝感走出了50名共和国开国将军，这片热土上红色文化彪炳史册。

孝道文化感天动地。《孝经》曰，孝是“德之本也，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以孝治国，在孝子辈出、孝名远扬的安陆东境、郢县南境置一新县，命名“孝昌”。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改为“孝感”，意指孝亲之情感天动地。古代中国二十四孝中，“卖身葬父”的董永、“扇枕温衾”的黄香、“哭竹生笋”的孟宗，均出自孝感，载于《搜神记》《灵芝篇》等古籍及一些地方志。孝感先后成功举办16届孝文化旅游节，荣获“中国孝文化之乡”称号，由此凝聚而成的“至孝至诚、图强图新”孝感城市精神，集中体现了孝感人民的精神追求，孝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孝文化名城。

饮食文化驰名中外。孝感名优特产当数麻糖、米酒。孝感麻糖采用传统的配方精心配制，经过12道工艺流程、32个环节制成。其外形犹如梳子，色白如霜，香味扑鼻，风味独特。孝感米酒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地方

名品，它白如玉液，清香袭人，甜润爽口，浓而不沾，稀而不流，回味深长。1958年毛泽东主席到孝感视察，品尝孝感米酒后称赞“味好酒美”。孝感麻糖、米酒多次参加全球采购（武汉）论坛暨采购博览会、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深受中外参展商家和各国人士的喜爱。

名人文化璀璨夺目。楚国宋玉在蒲骚（今孝感应城市）作《九辩》，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则表现出楚地民歌的奇杰伟丽。唐朝诗仙李白仗剑远游，“酒隐”安陆，十年间或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或烟花三月之时在浩浩长江边上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宋时安州宋祁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蜚声文坛，世称“红杏尚书”。清代初，《明史》总裁官孝感人熊赐履成为康熙皇帝的帝师，也是一代有名的理学巨头。近人宋杨更是以一首《小儿郎》民歌传唱大江南北。

民间文化繁花似锦。逢年过节，各类民间文化艺术活动伴以锣鼓鞭炮响亮登场，街巷摩肩接踵、人声鼎沸，楚剧唱腔汉风楚韵，余音袅袅；皮影表演栩栩如生，逼真传神；水墨漫画寓意深刻，夸张浪漫；三节龙雄劲壮观，奇异有趣；雕花剪纸花样百出，美不胜收。一首民间的歌谣唱道：“孝感姑娘灵，孝感媳妇巧，剪鸟鸟会飞，刻马马会跑，雕人人说话，绣花花会笑！”这些民风民俗，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孝感人民的智慧和才华，饱含着孝感人民健康活泼的审美情趣和喜怒哀乐，展示着孝感的古老文明在新时代继承弘扬和创新性发展的丰姿。

胡绍翔，孝感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黄念军，孝感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一剪神韵夺天工

◇ 周 芳

引 子

见到池泉是在位于孝感南大经济开发区的孝感雕花剪纸研究所。她上午刚从西湖桥社区回来，谈及雕花剪纸走进社区的情形，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块蜡盘，一张纸，几把刻刀，十几人围坐一起，说说笑笑间，拉拉家常，看看花样，一张喜窗花就跃然而出。“群众学习雕花剪纸的积极性非常高，每次社区举办这类活动，她们老早就等在那里，星火社区、晒书台社区……所有社区都是我们雕花剪纸的阵地。”说到兴奋处，现任孝感雕花剪纸研究所第三任所长的池泉右手一扒拉，在眼前划了一个大圈，恍若雕花剪纸正在潯川大地上开出一朵一朵绚烂的花。

作为古荆楚大地的民间艺术瑰宝，古老灿烂楚文化的活化石，孝感雕花剪纸早在南朝梁·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正月初七，是人的节日，家家户户剪彩纸或镂金箔，制成人形，贴在屏风上，戴在发髻上，做七种菜肴供于案台，敬神祭祖，求神祖保平安、赐丰收。此习俗在荆楚大地民间蔚然成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人日》诗中曾云：“镂金作胜传荆楚，剪彩为人起晋风。”

清光绪八年（1882年）编纂的《孝感县志》还记载：“十五日为上元道家，以

此日为天官赐福之辰俗，或绘冠带一人，横持一纸书天官赐福粘于屏壁。”

从距孝感城二十公里的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器上，从随州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漆棺上，依稀可以窥见孝感剪纸艺术的早期萌生。在人类尚未萌发对美有意识追求之前，剪纸大多作为一种崇拜物的代言装饰出现，而这些装饰又多与上古的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后来，雕花剪纸便渐渐渗透到孝感人生活的细枝末节，如女红一事。

女红，一直是闺阁女子最重要的工作。重刺绣、女红的传统，可从《孝感志》一个有趣记载中略窥一二：

有鸟，黑羽，声清圆，细听之，其音各肖，而人因肖声以为虐。告农夫则为：割麦插苗。告妇则为：桑蚕结果。告行人则为：公无渡河。告仕官则为：万邦协和。告学人则为：切磋琢磨。告闺阁则为：描花绣朵。疑即百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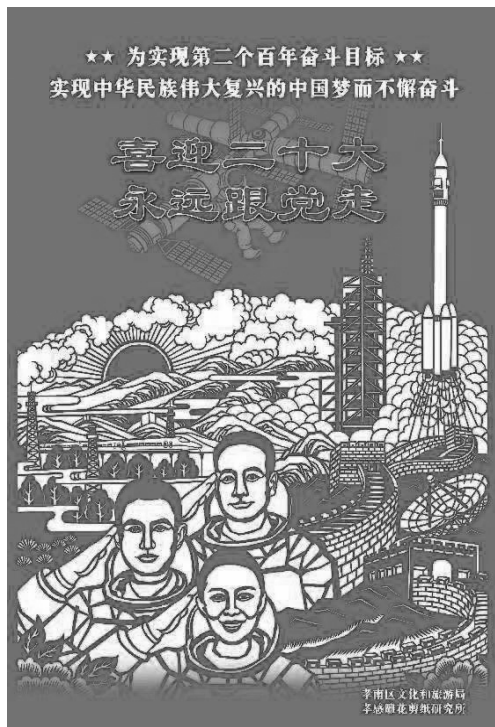
描花绣朵对女子来说，重要性如同稻麦之于农夫，桑蚕之于蚕妇，渡河之于行人，治安之于仕官，光阴之于学子。

悠久的历史 and 坚实的群众基础，使孝感雕花剪纸世代相传，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孝感雕花剪纸恰似一簇烂漫山花，于百花园中热烈绽放。在此罗列孝感雕花剪纸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时刻：

1953年，成立第一个雕花剪纸艺人协会，首批入会的专业艺人多达两百多名。

1988年，以孝感雕花剪纸为题材的专题艺术片《一剪美人间》获“第五届里约热内卢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

1990年，取材于孝感民间神话传说董永与七仙女故事的剪纸作品《槐荫记》，在世界博览会上获特别奖，被美国俄亥俄州政府收藏。



雕花作品《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

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同年10月，依托孝感雕花剪纸，孝南区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2009年，孝感雕花剪纸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10年，孝感雕花剪纸作品参加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元素”展览。

2012年，孝感雕花剪纸艺人代表应邀参加“第三届中国剪纸艺术节暨第二届蔚州国际剪纸艺术节”，接受中央电视台“北纬30°中国行——远方的家”摄制组专题采访，并在CCTV1和CCTV4播出。

2014年，孝感天仙雕花剪纸有限公司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审批。

2017年受邀参加在俄罗斯和波兰举办的“湖北传媒周”活动，现场展演孝感雕花剪纸技艺。

2019年，孝感雕花剪纸传承中心在孝感南大经济开发区湖北之海工业园内挂牌开放。

孝感雕花剪纸，穿越千年时空的清响，在纸面怡然地摇曳着水色天光、人间万象，言说这方水土的精髓和风采，实乃孝感文化一张靓丽名片。

二

几千年的积淀，几千年的传承，孝感雕花剪纸这株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之花，吸吮了荆楚山河的灵秀之气，聚藏着孝感大地的乡土之美，渐渐发展为传统深厚、风格稳定的独特品种，成了远近闻名的湖北一绝。

北方剪纸多重“剪”功，其特色“天真浑朴”；南方剪纸多重“雕”功，其特色“玲珑剔透”。孝感雕花剪纸则因其特殊的地理

位置，融合了南北艺术之长，“剪”功和“雕”功共存，以构图别致、线条简练、刀法流利、破功精细而自成流派。

以张秋屏、夏翠香等农家妇女为代表的“剪”纸流派，她们的作品是用普通剪刀“绞剪”而成，一次剪两三张，剪纸技艺娴熟，精巧生动。这些农家妇女心灵手巧，以世代相传的“底样”为依据，走家串户，相互临摹，或剪制中略加变化，自出机杼，常作信物或礼品在相应的群体中传承。手艺精湛者，被誉为“灵姑娘”“巧媳妇”。

其中出类拔萃者当数夏翠香老人，她4岁开始学艺，一双巧手、一把剪刀、一张红纸，被誉为“三神”（神手、神剪、神纸）。其剪纸作品，被人们惊叹为“可摘下来的花朵”！

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胡均启先生为代表的“雕刻”剪纸，其作品柔媚秀丽，风格独特。胡均启出身剪纸世家，祖父、父亲和大哥都热爱各类民间技艺。他从小就随父、兄出外扎灯结彩，16岁开始潜心钻研雕花剪纸。从艺50余年，在继承和创新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业绩载《辞海》《地方志》和《名人录》。

胡均启收徒众多，其精湛技艺毫无保留地得以传承，今天孝感雕花剪纸的发展，与他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的儿子胡云甫，现为湖北省工艺美术大师；嫡传弟子管丽芳，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湖北省工艺美术名人；再传弟子徐惠斌，曾任孝感雕花剪纸研究所所长。胡均启的众多弟子传人，现都已成为孝感雕花剪纸的中坚力量。

孝感雕花剪纸在制作上，讲究“刀功”和“破功”，要求运刀胜笔，连而不断，握刀正、下刀顺、行刀匀、开切严，正如艺人



雕花作品《富贵平安》 作者 池福新

所说：“茎如花线叶圆润，花蕊突出破功严，虫鸟眼睛要认真，刀法流利见功能。”

造型上，图外有形，形中有景，黑白对称，阴阳结合。花中有花，粗中有细，均衡对称，大胆夸张，着意传神。

色彩上，以单纯、简洁色调为主，现已从传统的单色发展到套色、分色、衬色、点色等多种方法，创作出了彩色立体剪纸，力求达到作品形象美、题材广、寓意深的艺术效果。

作品完成后，必须“提得起，贴得正”，阳刻以“连而不断”为表现手法，阴刻以“断而不连”为表现手法。所有这些，都充分表现了孝感雕花剪纸的主要特征。

孝感雕花剪纸取材大多来源于民间，蕴含着民族精神气质，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与民俗民风紧密相连，乡土风味极浓。其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创造出了大批有艺术价值的剪纸绣花样，如赞颂为官清廉的系列剪纸《清官图》，祝愿吉祥的《福禄寿喜》，妙趣横生的《扑蝶》，遐思无限的《梁祝缘》，高洁典雅的《黄鹤楼》，反映现代生活的《喜庆丰收》《民族歌舞》《敢教日月换新天》……无不寓意深长，或歌颂盛世，赞美英雄；或伸张正义，抨击邪恶；或寄托人们对理想的渴望与追求，祈祝生活幸福、后代昌隆、人寿年丰及辟邪消灾，体现了古老而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

孝文化沃土的滋养、孕育，现代社会生活的激励、催发，使得孝感剪纸随时代前进而与日俱新。然而，看似平常的雕花剪纸，创作起来极费心力，凝聚着艺人们的心血汗水和无穷智慧。虽然有过昔日辉煌，但随着



雕花作品《喜鹊登梅》 作者 徐福斌

时代的变化，传统审美观念逐渐淡薄，需求衰减；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小型分散的手工劳作已不适应当今的“规模效应”，本大利微，导致参与者愈来愈少，不少艺人渐渐淡出创作舞台，无可奈何地结束艺术生涯。更为严重的是，昔日传人大多年事已高，纷纷谢世，雕花剪纸面临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的危险。抢救这一宝贵遗产，实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为了保护这一珍贵遗产，当地政府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把开发孝感雕花剪纸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系统工程来抓，广泛宣传动员相关部门参与，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

深入、系统地开展调查、搜集和研究工作，进行抢救性发掘。2013年，文化部启动“非遗”数字化管理，公布28个入围试点名目，孝感雕花剪纸名列其中。为满足“非遗”保护需要，孝南区文化馆工作人员深入剪纸老艺人家中，录制8位剪纸老艺人的视频音像和图片资料，整理出剪纸原作6831件，复制残缺作品287件，制作影像资料9盒，光盘43张，时长30多个小时。

资料上传到文化部，以高质量顺利通过了验收，取得全国作品质量第一、数量第五的好成绩，作为典型向全国推广。

孝感市、孝南区两级政府领导多次将保护传承孝感雕花剪纸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创造更为宽松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投入开发，广泛开展“文企联姻”，将部分雕花剪纸艺术作品开发成商品进入市场，形成文化产业。孝感雕花剪纸的应用范围得到极大拓展，改变以往只是“灵姑娘”和“巧媳妇”们作绣花样子的用途，将其制成特色商品，合理开发利用，体现经济价值，进行生产性保护传承。目前已与孝感天仙雕花剪纸有限公司、湖北之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联手合作。

定期举办雕花剪纸艺术节和展览，举办短期培训班，传播剪纸艺术；职业学院、中小学美术课增添孝感雕花剪纸内容，着眼未来，大力培育艺术新人。目前，孝感雕花剪纸传承中心是中南民族大学的课外实习基地，在孝南区实验小学等4所学校挂牌设立孝感雕花剪纸传承示范学校。

如今，孝感雕花剪纸研究所在多个社区设立了培训基地，节假日或社区有重大活动时，雕花剪纸艺人们去现场献艺，送去制作工具，指导群众创作，挖掘、培养传承人。

现在的孝感雕花剪纸，早已超出单纯的艺术范畴，而是全方位融入社会、经济和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应用范围涉及报刊题花、杂志封面、礼品装饰、广告宣传、插图书签诸多方面。原来的单一品种逐渐向“品种多样化、功能齐全化、内容时尚化”转型，成为美化环境的装饰品、艺术爱好者的收藏品、旅游观光及大型活动的纪念品、人际交往的馈赠品。创作内容也不断拓宽，由单纯历史题材到现实生活题材，在秉承传

统特色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尾 声

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剪纸艺术在历史长河中代代相传。孝感雕花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都是师徒相传，有一个传承的脉络，有四代、五代剪纸世家，有上百户人家的剪纸湾村。池泉正是孝感雕花剪纸第四代传人，也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的父亲池福新是第三代传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第二代传承人则是池泉的奶奶管英。

在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下，池泉在读初中时第一次拿起雕刻刀，这一拿就是近二十年。如今，池泉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每次带着雕花剪纸团队到社区去传授技艺时，尽可能带上孩子一同前往。孩子也会把自己做的雕花剪纸作品带到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认识孝感雕花剪纸。

当我们结束采访，正欲告别池泉时，她六岁的小女儿从外面跑进来。我说，你不可以剪一朵花送给我呀？小姑娘笑嘻嘻地拿起一张红纸，折叠几番，随后，熟练地操起剪刀，一下、两下……剪刀如行云流水在纸上游动。不一会，一朵漂亮的纸花盛开在我们面前。

孝感雕花剪纸犹如一簇烂漫的山花，在民间艺术之林吐露芬芳。艺术的火种只要代代传承，春天就生生不息。

周芳，孝感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

老潯河“新生记”

◇ 董晓芳

有多少文明的光影，与河流相伴而生？
在孝感，有一条河，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孕育、滋养着城市的根脉，绵延不绝。她，就是老潯河，孝感的母亲河。西起府河东大堤，东至三军台汇入槐荫河，全长 8.6 公里。

她，曾浩淼清波，带来“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渔火”的盛况。然而，长期以来，两岸生产生活污水无序排放，部分河段基本丧失水体自净功能，严重影响人居环境。母亲河满目疮夷，浑浊不堪。

2017 年底，孝感市委市政府顺应百姓美好生活期盼，打响了老潯河综合治理的攻坚战。2021 年 1 月，孝感市政府宣布，老潯河一期综合治理工程提前两年完成。今年，老潯河综合治理二期工程已在实施中。

一河清水再现，老潯河两岸，旧貌换新颜。这一奇迹的背后，是一首奔腾激荡的

追梦曲，是一部大拆建的史书，更是一次城市的集体寻根。

孝感城因老潯河而兴

潯河出河南灵山黑沟，自北南流。沿途收大麦河（源大悟山）、淮水（源大悟山）、青山河（源双峰山）……一路溪流汇入，其间先折而西流，再合而南流，蜿蜒曲折，绕山携水。最后在距离治所六十里处，一分为二，东流者乃名潯河，取其“拖绕山谷如环”谐音，最终出孝感境入长江。

潯河，是孝感这座水边城市的生命之源。尤其流经城区的故道——老潯河，更是与孝感城、孝感人民血脉相连。

逐水而居，夯土筑城。“三关障其后，潯汉阻及前，跨阜临湖，形势巍焕，物产丰



1941年的孝感古城遗址

富”，孝感城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水而兴，孝感城市根脉从这里延续。“潯川八景”中的“西湖酒馆”“槐荫琴堂”“泮沼荷香”“文昌阁”就分布在老潯河沿岸。

一城开六门，一河流四门，岸有四码头（实为六码头），是旧志里孝感县城的轮廓。县志有云：孝感县城即唐代的古潯河镇，又称首善镇，今称孝感城关。

68岁的郭忠新老人一生致力研究孝感城史。他介绍，孝感城区作为县治始于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年），县城始建于明正德七年（1512年）。原为土城，周一千二百丈，高二丈，阔一丈五尺。设四门，建城楼。嘉靖年间至万历二年，历经筑堤防汛、重筑土城、再建砖城，至此城邑共六门，即西门（迎祥门）、南门（时熏门）、学门（文昌门）、小东门（复旦门）、大东门（朝阳门）、北门（拱辰门）。

清民谚曰：“金西门，银南门，迎官接府大东门，挑水卖菜小东门，黑漆棺材出学门（一说瓦具竹木出学门），杀人放火是北门（一说杀牛剥羊是北门）。”

穿过西门内正街，经环城路，拐入西

门外正街，向河边走。河边一座石拱桥，是为西湖桥。整理完工的河道，焕然一新，细流缓缓。安置区沿河建，高楼林立，旧日低矮逼仄平房不复见。这一片曾是老孝感最繁华繁荣的中心。

老潯河，流经城区约8.6公里。

西门，是其起点河段。在西门，府潯河与老潯河曾经直接交汇，可直通汉江，是孝感航运要冲。

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各路中外商贾纷纷在此设店开铺，典当钱庄、澡堂、酒楼、客栈、熟食、茶馆、牙行……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商通四海，繁荣似锦。故有“金西门”之称，一直持续到民国三十年代。

老潯河水运四码头中，西门大小码头范围最大，西至河口，东至西门外壕沟（护城河）入口处。沿岸帆樯如林，入夜桅灯似星，小舟穿行如梭。装卸货物的“吆喝”声不绝于耳。

提西门小码头，或许不明白，换个名字——城隍潭码头，就好理解了。大概在今天的环城西路与解放西路交汇处。在老潯河征迁中，其遗迹在埋没40多年以后被挖掘出来。城隍潭码头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末，从宋代开始到清末，都是老孝感城最繁忙的码头之一。

老潯河过了弯道处的城隍潭，流经南门。南门曾以零售为主，粮油业、竹木业兴旺，兼有不少店铺和手工业作坊。商业仅次

于金西门，得名“银南门”。至今，南门桥附近依然热闹，店铺林立。南门桥河段，过往有石板垒叠上岸的码头。孝感人称这里是官码头，来往的客官，多从该码头上岸。其实，两岸民众，日用杂货，也由该码头上船。南门桥诞生后，该码头不复存在。

潯水过南门，缓缓至学门（文昌门）。此门系万历元年（1573年）建砖城时增设，因设于儒学之南，故称学门。

潯水在城区流经最后一门——小东门，随即向城外东流而去。

郭老说，小东门对面是黄花垸，周围湖垸的农民以种植蔬菜瓜果为生，挑至小东门外卖。日日饮潯河水，小东门附近居民遂以挑水为业，故有“挑水卖菜小东门”之说。

小东门码头，分上、下码头。挑水，卖菜，凌晨即起，未明即兴，码头喧嚣热闹，唤醒了老城的黎明。近些年，老潯河上架起长征南路桥、玉泉南路桥，小东门的两个码头，也消失于人们视野。

大东门和北门并不临老潯河，却有一条护城河与潯水连通。

东门自古以来为官家所居。从省、府来孝感的官员多乘官船经水路到孝感。上岸后，经东门迎接入城，故有“迎官送府是东门”。北门于明正德七年（1512年）开辟。出北门便是驿道，经三里棚过理丝桥到陡山铺、桃花驿（杨店），至省城等地；由陡山铺又有驿道至小河溪驿（今孝昌县小河镇）通京城。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千年古邑，经水灾和战乱，六门屡毁屡建。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鉴于武昌之战封锁城门造成巨大死亡惨状，战后拆除了武昌的许多城门，修建马路。孝感效法拆除城墙。自此，孝感城墙全部拆毁，

六门不复存在。陆运发达，水运式微，码头也逐渐萧条至消失。

老潯河的“阵痛”

水可兴万利，亦可成大患。千百年来，潯河水害频发。“啮岸撼城，屡修屡溃。”民国时，有记载的就有四次洪灾，“须臾之间，忽因水势逃避不及，男女老少多被淹没……哀号之声，惨不忍闻。”

孝感史志资料里提到，老潯河干流孝感城关以下河道弯曲狭窄，堤防低矮。1954年秋，老潯河汪家窑水位达到30.10米时，堤垸四处溃口，孝感城关以南一片汪洋。

治潯河从嘉靖年间开始，历朝历代做过努力。筑堤，加固，抵御洪水。1959年府潯河改道。老潯河改道、新河道开挖11公里，一河两堤，新河道汪家窑（现河口大桥）至卧龙潭与新府河汇合（孝感城关留下的老河道北有河口闸与新河道相通，南有鲢鱼地排水闸与府河新河道相联）。

水驯服了，凶猛的洪水沿潯河新河道奔流而去。老潯河成了内河，迎来了再次繁盛。店铺林立，企业兴办，火红一时。

老潯河沿岸的老人们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城区人口增加，城镇化进程加快。从老潯河西边到东边，依次出现了皮革厂、化工厂、化肥厂、屠宰场、卫生纸厂、黄板纸厂、麻球厂等。

这个时期，这条内河对沿岸的工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又承载着防洪排涝的功能。

可城市快速向前，伴随而生的工业经济带来繁荣，也带来次生影响。老潯河首当其冲。城市工业化时期，大量的工厂、货运装置出现在老潯河滨水区，导致滨水区出现

了大面积的硬质建设，其渗水、持水性能逐渐变差。兼之生产生活用水无序排放，建筑垃圾随意倾倒，河道变窄，河水变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老澧河两岸各生产小队开始打井取地下水。到1985年，井水也不能喝了。水烧开后发红有异味，只能洗衣洗菜，居民开始购桶装水饮用。

“五六十年代淘米洗菜，七十年代洗衣灌溉，八十年代河水变坏，九十年代鱼虾绝代。”这首顺口溜，成了老澧河变化真实的写照。

到了工业化后期，孝感陆路交通发展兴起，城市重心转移，老澧河逐渐边缘化，成为城市外围的“臭水沟”。外出务工，弃耕抛荒，市民生活逐日摆脱对老澧河的依赖。老城区也不复昔日盛景，街巷冷落，繁华渐消。

以南门桥为界，老澧河分南北岸。清民谣有“六城四码头，九街十八巷”形容澧水人家市井风情的繁荣景象。这指的是北

岸——城关人家的景象。如今，九街还在，十八巷多半凑不全，间或有那么一两株古树、一间老屋，甚至一石一瓦，能寻到过往踪迹。

三元井巷，是老城区“十八巷”里仅存的老巷之一。三元井巷里住着一位喜欢研究老城文化的长者，大家尊称他为“朱老师”。朱老年有八旬，白发苍苍，却是耳聪目明。他拿出自己整理撰写的厚厚几摞文稿资料，边翻找边讲解。孝感较古老的“九街”，指的是宪司街（解放街）、鼓楼街（府前街）、跑马街（书院街）、分司街（中山街）、东河街（新华街）、西河街、汤家街、北门内正街、西门内（外正街）。眼下，西河街、汤家街、北门内正街、西门内（外正街）尚存，另外几条街其实也并未消失，只是早已易名。

九街蜿蜒曲折，互为贯通。贯通其间的小巷，越深入越安静。铁皮的炉子，慢慢地升起来，呛人的烟雾里，是历史的味道。

几经变迁，老街的房屋渐渐新式、洋气起来。那些存留的老屋，多数已无人住。雕花的门窗，斑驳的木柱，蛛网勾连。谁家院落紧闭，红砖矮墙，却锁不住那斜倚而出的梅枝。

九街十八巷，是个寻古思幽的好去处。文昌阁、城隍潭、西湖桥、枚宁关……仅仅名字，轻轻吟出，古雅有韵。更遑论背后的故事，流转变迁，令人追慕。如今都剩下了怀想。



1959年修建河口大桥

潯水南岸，是卧龙乡地界。5年前，这里还是村庄交错。老潯河在村前缓缓流淌。但水也不再清透，垃圾倾洒，臭味难闻。

母亲河生机渐失。因水而生、而兴的老城区，也因水而落寞。

老潯河重获新生

城区人口急剧增加，工业企业扎堆集聚，加之城市污水管网不配套，大量生活污水长期直排，老潯河污染日益严重，常年处于劣五类水质，多次被环保督察“亮红灯”，严重影响人居环境。

即便关停整治、限排限放，也挽救不了河道日益黑臭，两岸生机渐凋零，令人叹惋。

母亲河日渐枯竭，这是一座城市的阵痛。2008年，孝感市实施“三河连通”工程，河道清淤，疏浚活水，对潯东水生态进行系统保护与修复。

2010年1月12日，作为“三河连通”工程二期的老潯河整治工程开工。二期工程仅实施了河道清淤和翻板闸改造工程，通过不定期地引潯河水冲老潯河污水，老潯河水环境污染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水体污染、环境脏乱差的整体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治标不治本，没堵住污染源。边治理，边污染。至2017年，老潯河仍处于劣五类水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依水而生、傍水而兴的孝感人心中，“守护母亲河重现生机”的梦想从未像这样让人希冀可期。

2017年11月2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老潯河综合治理动员大会，宣布重大民生工程——老潯河综合治理工程正式启动，

计划用五年时间将老潯河打造成城市新名片，补齐生态民生短板，让碧水蓝天扮靓美丽孝感。

推出《老潯河综合治理总体规划调整设计》，以老潯河综合治理为切入点，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根据实施方案，老潯河综合治理将分拆迁安置、截污清淤、园林景观、基础配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环节。

治理两岸4.6平方公里区域，征迁6665户居民、125万平方米，“相当于搬迁一个小县城，难！”

这场硬仗，事关当前，关乎子孙，功在千秋。

市委、市政府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发展的眼光谋划老潯河综合治理项目，以环境、空间、功能、基层治理、产业“五个”再造为核心，将老潯河打造成为串联城市功能片区的“景观轴”、展示城市空间品质的“会客厅”、市民休闲娱乐观景的“亲水带”、焕发城市活力的“新片区”。

市政协主席、老潯河综合治理建设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张汉平亲临一线协调指挥，各级各部门紧密协同配合，紧盯目标任务，狠抓重点工程，实行“五化”管理，强化责任落实，倒逼作风转变。不要看，不要等，更不能拖，只有一个字：“干！”苦干实干、快干大干、巧干科学干，加快速度改变现状。

老潯河综合治理是重大生态工程、重大民生工程，是城市“双修”的重大建设工程。站在新的起点，秉承全新理念。一场场协调调度会召开，一个个政策新规出台。干部带头拆，老党员做示范，群众积极响应。倾情付出，全力支持。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拉开序幕。74天完成487户6.37万平方米的房屋征收和拆除，“城西速度”诞

生；为保公平，推行摇号选房签约办法，创下“一天签约上百户”的“文昌速度”……

担当、创新，历经3年1000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老潯河综合治理一期工程提前两年完成，初步实现“安居、治污、发展”目标，9个安置区全部竣工。孝感创造了“老潯河建设速度”。

从论证到建设，从选房到搬迁，从生产到生活。征途或苦辣或酸甜，故事或跌宕或平淡，都与老潯河息息相关，真实存在，见证了潯水儿女自强不息的品格。

老潯河重现一河碧水。两岸柳树成荫，花卉辉映。小径、木桩、亲水平台，漫步河两岸，如置身园林。

治水、亲水，新时代，孝感谋求“人水和谐共生”。

水质改善，只是孝感人水共生的第一步。挖掘沿线两岸文化遗迹内涵，让母亲河的生态、文化、经济效益充分彰显，才是老潯河综合治理工程的点睛之笔。

从家门口的“臭水沟”，到推开窗就是水景观。对孝感人而言，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观水”变得如此幸福。

70余岁的罗一才老人，即兴赋歌一首：

“春去夏来，不觉又是秋。

老潯河下一小舟，

……

钓的鲜鱼沽美酒，

一无烦恼二无忧。

日行三桥消岁月，



治理后的老潯河涅槃新生

文化长廊度春秋。

南腔北调任咱唱，

……

环境美，清闲自在潯河悠游。

习主席思想是船舵，

党是人民的好舵手。

工农商学兵学习记心头。

为实现中国梦越干劲越足。”

路网纵横，三河连通，以老城为依托，辐射东城与周边。孝感，强筋壮骨，日新月异。水系相通入长江，一衣带水同城梦。

2020年底，孝感谋划了“主城崛起、两带协同、孝汉同城、多元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打造武汉城市圈副中心。

潯水新生，老城生机勃勃。水波涌动，孝感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

董晓芳，孝感日报社会新闻部主任

武汉解放时一份通告的两个版本

◇ 田联申

今年5月16日，为纪念武汉解放73周年，辛亥革命博物院推出“文物藏品中的英雄武汉”展览，其《换了人间·巩固政权》部分，展出了一张“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通告”。

1949年5月16日，这张通告从凌晨起出现在汉口主要街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维护秩序、迎接解放的作用。

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通告

（于省参议会）

前因战火迫近武汉，恐一旦延及市区，则灾害难免。武汉人民团体、慈善团体、省市耆宿及社会热心公益人士，本此情势需要，共同组织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办理临时救济及维护全体市民安全事宜。刻下局势转变，武汉已成真空地带，自应加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一切生命财产。当此非常时期，务望我全体市民同胞，发挥互助精神，竭诚合作，力持镇静，各守岗位，各安生业，以期安堵如常。倘有不肖之徒，乘机扰乱，肆意破坏，或杀人放火，或抢劫奸淫，或寻仇报复，定当执行人民之公意，立予逮捕，交付严惩。特此通告周知。

辛亥革命博物院展出的通告（以下简称“辛博版”），为武汉收藏家刘汉桥提供，与此前仙桃市张难先纪念馆展出的通告（张难先收藏，原件存湖北省博物馆，以下简称“省博版”）同中有异。经仔细比较研究后，新展“辛博版”通告显得更为珍贵一些，透出了武汉黎明前的一些历史信息。

通告产生特殊时刻

1948年秋，湖北省参议会的参议员和社会贤达人士周杰、贺有年、许莹涟、胡忠民等，发起组织“十人座谈会”，以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为基本诉求。

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向南推进，白崇禧为获取掌控南方数省的政治优势，利用湖北省参议会代议长艾毓英和地方元老李书城、张难先、耿伯钊等发起湖北“和平运动”，并于12月29日通过省参议会一届六次大会发布了其亲自过目修改的吁和通电，史称“艳”电。

1949年初，武汉成立了“湖北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后又成立了“华中七省二市人民和平促进会联合会”（湖北、湖南、

安徽、江西、河南、广东、广西七省及汉口、广州两市)。其间,白崇禧还委派李书城与耿伯钊北上,代表其与共产党进行局部和谈。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位,白崇禧寄希望于李宗仁政府与共产党划江而治。

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为防止国民党军对武汉进行大规模破坏,张难先、李书城等以地方耆宿的身份,提出有关维持武汉地方秩序的要求,将“湖北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改为“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据《申报》5月8日报道:鄂省耆宿及武汉民意机关代表多人,七日午会商,决定组织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并推定张难先、李书城、耿伯钊、夏斗寅百余人为委员,准备在任何危险情况下维持武汉安全秩序。

临时救济委员会以张难先为召集人,经汉口市商会理事长贺衡夫出面,与社会知名人士和工商界人士联系,会址设在汉口市商会内,下设总务、治安、财务、联络、服务、交通等组,并成立汉口、武昌、汉阳三个执行处。

救济委员会成立后,遵照陈毅、刘伯承接见李书城、耿伯钊时的指示,大批民主人士和广大武汉民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破坏、反搬迁、保城市、迎解放的运动。在武汉地下市委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做好配合,保卫水厂、电厂、邮电、车船、码头、工厂等重要设施。联络维持武汉真空期间治安的警力,储备粮食以备急需,迎接解放军进城等工作。

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产生了《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通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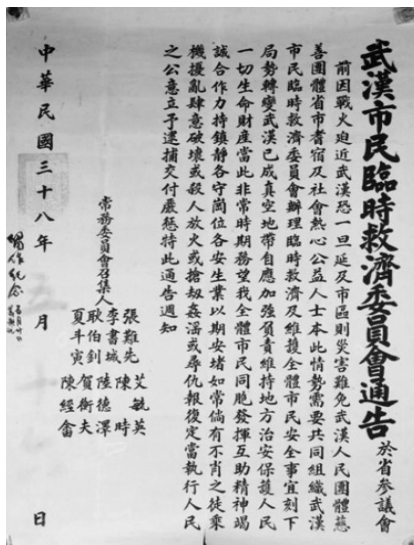
两个版本有所不同

通告的两个版本内容一致,但有两点不同,反映了当时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地下党组织的机智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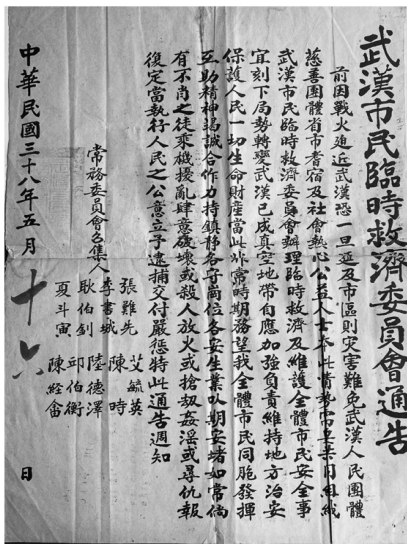
一是书写者不同。

“省博版”赵合俦书写。据《湖北文史资料》1989年第一辑张云冕《武汉解放前一段工作的回忆》说:“文字内容,颇费斟酌,数度磋商后决定由林渊泉同志起草,赵合俦同志书写,林宪章同志找可靠厂家印刷并密为收藏。他们都是地下盟员(中国民主同盟)”。林渊泉(1889—1963),湖北黄冈人,曾任恩施县县长、省政府参议,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赵合俦(1902—1982),湖北黄冈人,擅国画,1934年留学日本,历任武昌美专教授等职。

“辛博版”张文澄书写。时任武汉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在《解放战争时期武汉市委



湖北省博物馆收藏通告



辛亥革命博物院展出通告

地下革命斗争概述》中回忆：1949年5月15日，他和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进入保元里9号地下指挥所，通过电话命令各系统坚守岗位，为保卫人民的城市而战斗。午夜以后，得知敌军已经撤完，指挥部当即通知市和平促进会，将张文澄代为起草的安民布告张贴出去。这里需要说明，此时和平促进会已经变更为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张文澄也曾撰文《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在战斗》（《武汉文史资料》纪念武汉解放60周年特刊）回忆，但未提及起草布告一事。“张文澄代为起草”，实际是张文澄抄写。

二是落款署名不同。

“省博版”为张难先、艾毓英、李书城、陈时、耿伯钊、陆德泽、夏斗寅、贺衡夫、陈经畬。

“辛博版”为张难先、艾毓英、李书城、陈时、耿伯钊、陆德泽、夏斗寅、邱伯衡、陈经畬。

为何换下贺衡夫？贺衡夫当时为汉口市商会理事长，在湖北武汉颇有影响。据武汉市志记载：贺衡夫1949年4月，参与湖北知名人士张难先、李书城及工商各界代表组成的汉口市人民和平促进会和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开展“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运动，迎接解放军进城，后遭武装暴徒袭击，被迫离汉赴香港。另据王际清《武汉解放前夕我被绑架的经过》（《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12期）披露，特务准备抓捕贺衡夫的时间是1949年5月8日夜晩，贺衡夫得知消息后，当晚乘车南下到香港。武汉市地下党组织应知道这个情况，因此张文澄在抄写通告时，将贺衡夫改换为邱伯衡，也是为了保护贺衡夫。邱伯衡，参加过辛亥革命，解放后任民革武汉市委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哪个版本张贴街头

通过两个版本知情人的回忆，“省博版”印刷时间早于“辛博版”。“省博版”上有“于省参议会”，通告是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议会开会决定通过的，9人中的艾毓英为参议会代议长（参议会议长为何成濬，此时已离开武汉南下香港），因此选择在省参议会开会。通告左下角有“留作纪念 五月廿日 義痴记”——张难先号義痴，字难先，留下了手迹。通告上印有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月日处空白，印刷时间可能在5月前。

“辛博版”时间栏印好“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日字处空白，可以推测是在贺衡夫离开武汉的5月8日后印刷的，临近武汉解放。曾惇回忆，通告于1949年5月15日午夜后（即16日），在汉口主要街道张贴。

5月16日，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派代表，前往汉口市郊岱家山迎接解放军四野先遣兵团118师进城。17日上午，先遣兵团153师一部进入武昌市区；当天下午，江汉军区独立一旅从蔡甸进入汉阳城区。据《大刚报》5月18日消息，当天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正式宣告结束，同时成立“武汉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在军管会未到达前，负责维持市内秩序”。22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

从和平运动到迎接解放，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作出了有益贡献，这两个不同版本的通告，共同留下历史的一页。

田联申，武汉市交通科学研究所退休干部

我与“贱三爷”的不解之缘

◇ 沈远义（口述） 宋 艳（整理）

武汉话里有一句歇后语：“汉阳来的——贱三爷”，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福不享、自找罪受、自讨苦吃。

那“贱三爷”又是何许人呢？他呀，穷苦百姓爱他，地主老财怕他，麻烦的事情难不倒他，抖狠的活儿吓不怕他。他就是武汉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位民间机智人物。关于他的故事，据传最早成型于明代中期，这样算来，“贱三爷”现在已经有 500 多岁了。

爷爷是有名的“故事篓子”

我老家就在老汉阳县的蔡甸镇上，和汉阳来的“贱三爷”算是老乡。我的祖父沈海山，曾在蔡甸镇上开茶馆，后来父亲沈开堂又开起了饭馆。茶肆酒楼出生的我，可以说是听着故事长大的。南来北往的人，将四

面八方的信息汇集在这里，真的、假的、善的、恶的，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故事。

而我最喜欢听的，还是爷爷讲的“贱三爷”故事。爷爷是当地有名的“故事篓子”，很多人就是为了听爷爷讲故事而到茶馆喝杯茶的。这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单调的年代，可以说是一种很实惠的娱乐方式。

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是爷爷讲的《明天杀您家》。我们武汉人说话，总是“您家”上前，这是尊敬对方的意思。而在这篇故事里，“贱三爷”却通过一句“您家”将买肉的刘善人戏弄了一番。

贱三爷卖肉的时候，天天有人来买肉。有时，肉卖完了，要是有人来问有冇得肉卖，贱三爷就会说：“对不起您家，明天杀了猪，请您家来割肉。”有一年春节前，刘善人来割肉，他财大气粗地问：“喂！有冇得肉卖呀？”贱三爷随口答：“今天有得您家，

明天杀您家，再卖您家！”刘善人气得调头就走。

听了这个故事，我也学着“贱三爷”戏弄周围的人，爷爷看见了总是狠狠地教训我一番。爷爷不让我学“贱三爷”，可是他的身上却始终有“贱三爷”的影子。他帮码头工人解决争端，他助茶馆伙计医治老母。他身上不仅有着“贱三爷”的江湖义气，更有着“贱三爷”的聪明睿智。爷爷常说“贱三爷”是我们穷苦人的代表，做人就要像“贱三爷”那样才行。

“贱三爷”这么好，可为什么还叫他“贱三爷”呢？而且一句“汉骂”——“你是汉阳来的贱三爷”，害得我们汉阳人都受了牵连。我把这个疑问说给爷爷听，可爷爷总是敷衍我说：“你长大了就晓得了的。”我不服周！时刻想着解开这个谜团，还“贱三爷”一个公道。

从此，我和“贱三爷”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开始亲近“贱三爷”

1949年武汉还未解放，因为饱受战乱，家里生意做不下去了，父母带我坐了一天的划子船下了汉口。我在汉口读书、教书、参军入伍、复员返乡、进工厂、调报社直至退休。可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我一定会把“贱三爷”带在身边。

我在部队当电影放映员的时候，有一次给战友讲“贱三爷”的故事。为我们开车的河南战友说：“原来‘贱三爷’是你们汉阳的人呀！”我问他么样晓得“贱三爷”的，他说，是祖辈们讲给他们听的。旧社会，河南人年年要出外逃荒要饭。有一年，一家



1993年《贱三爷》作品研讨会会场

三代上十口人到了汉口饿得走不动路了，只有等死！这时来了一位年轻人问了情况后，要他们去当铺当东西。他们哪有好东西当呀，只有把穿的戴的破烂拿去了。那青年原来是当铺里的朝奉，他把这些破烂当古董，当了许多银子给他们，要他们回乡度饥荒。这好的事、这好的人，他们河南人肯定要记在心间哪！问了人才知道这年轻人是“贱三爷”。所以，他们那里也听过“贱三爷”的故事。

我在工厂做工会工作时，常有支农的“双抢”——挖河道、挑堤、捡废铁等等。只要我在，休息时我就讲“贱三爷”故事给大家听，引得人人开口讲时，我就在一边做笔记。1975年，厂里派我到黄梅去招回一位职工的女儿。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就是不肯放人。有天晚饭后，我拿了条游泳烟到队长家请乡亲们谈天。屋里一下子坐满了人。我见人就发烟，然后给他们讲“贱三爷”的故事，也请他们讲故事给我听。这一互动哇，讲起来有得完。稍一停，我就讲，又发烟。队长家不停烧开水。直到一条烟发完，人们还不尽兴。第二天，队长主动找我解决问题，使我顺利完成了招工任务。

逢年过节，我和父母回乡去看望长辈亲朋，更是我搜集“贱三爷”故事的大好时机。可惜那些带着童年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慢慢地都消逝不见了。三义殿、火路口的圆门、墙角的土地公公庙、青石条的路面、青石条垒起的石凳，我只有将这些记忆融入到搜集的“贱三爷”故事当中去。让“贱三爷”永远活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永远活在老汉阳这片土地上。

随着我搜集的“贱三爷”故事越来越多，我对“贱三爷”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

“贱三爷”是个什么人呢？他其实就是一个集中概括了旧时代城镇劳动人民叛逆精神、丰富智慧和理想愿望的艺术形象。他的一言一行，都显示出底层劳动者并不因为穷困而心甘情愿受剥削受压迫的反抗精神。在“贱三爷”的身上，有豁达豪爽、机智幽默、聪明能干的独特个性，有舍己为人、扶危济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美好品德。

“贱三爷”改变我的命运

就这样，我一路不停地走，一路不停地搜集“贱三爷”故事。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贱三爷”的故事会改变我的命运。

我是个业余作者，平时写点诗歌、小说、戏剧、曲艺作品等。1980年，长江日报的编辑张英老师给我打电话：“小沈，你给我们讲过的‘贱三爷’故事，能写一篇来吗？”这不正是我为“贱三爷”正名、还“贱三爷”一个公道的好机会吗？我欣然接受任务并连夜写好由三个小故事组成的《贱三爷的故事》，没想到见报后反应强烈，“贱三爷”华丽转身，帮助人们认识了这位流传几百年的“草根英雄”。

也正因为这篇文章，武汉市群艺馆调

我到蔡甸参加学习班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学习班结束后，我决定将手里收集的“贱三爷”故事都整理出来，利用周日的一天一夜，写了40多篇。当我将这些故事交给专家、学者审稿时，他们看了又喜又惊，一个劲地说，没想到在武汉还有这么丰富的机智人物故事。

1983年，由武汉市群艺馆收集编辑的《武汉市民间传说故事集》出版，其中刊用了我的“贱三爷”故事90多篇。

1984年，中国社科院民间文学室主办的全国机智人物故事学术讨论会在咸宁召开。我受邀参会，并发表论文《关于贱三爷和他的故事》。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贱三爷是唯一一位活跃在城镇的机智人物。”

1986年，华中师范大学编辑出版《钱六姐和贱三爷》，又选用40多篇“贱三爷”故事。

1993年，《贱三爷》单行本出版，收录故事249篇。

这是“贱三爷”从“草根”成长为“明星”的过程，也是我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爱好者”成长为“民间文艺家”的过程，是“贱三爷”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让“贱三爷”走向广阔空间

从2006年开始，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词汇的兴起，我的身份又悄然发生了改变。这一年，“贱三爷”的故事被我老家蔡甸区政府申报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我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传承人”这个称谓，给我极大的使命感。我时刻想着怎样让更多的人晓得“贱三爷”，晓得“贱三爷”的故事。

其实,这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贱三爷”及其故事的挖掘和利用。

2001年,省民协组织我们三人编写《贱三称爷》的剧本,说是要将贱三爷搬上银屏。我很激动,日以继夜很快就拿出了电视剧本的初稿。可是因为融不到资金,这个剧本一直躺在中国文联影视艺术中心的柜子里。2003年,有动画公司找到我,希望和我合作拍摄52集动画片《小子贱三》,我负责剧本。公司根据我的剧本制作了几分钟片花,参加当年的法国戛纳电影节的展示,获极高评价,我以为这一次能够成功,可是又因资金不到位,动画片还是胎死腹中。后来,我又尝试过将“贱三爷”搬上舞台,依然因为资金问题不了了之。

“大动作”搞不了,我就搞些“小动作”。

2008年,由蔡甸区政府出资,《贱三爷故事集》(上下册)在武汉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我所有的“贱三爷”故事,共计450多篇,是迄今为止最完整“贱三爷”故事集。这本书在“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作品奖”的评选中荣获入围作品奖。

2009年,汉阳区地方志办公室也看中了我的“贱三爷”故事,他们将其中100个故事配上漫画,编辑出版了《贱三爷故事精编(图文版)》。

可是我并不满足“贱三爷”故事只停留在纸上,我希望他活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冥思苦想,我最后将眼光投放在了“老战士艺术团”上。

“老战士艺术团”是我退休后加入的一个业余文艺组织,我何不运用这个团队,用湖北人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展现“贱三爷”故事呢?说干就干,2015年,由“贱三爷”故事改编的小楚剧《烧借据》在汉口

中山公园首演,一炮打响。后来,我又将“贱三爷”故事改编成大鼓、渔鼓、道情、慢板、小曲、小品、相声、脱口秀等,至今已创作节目20余个,演出20多场次。

“贱三爷”的舞台形象得到观众的认可,逐步深入人心,受到大家的欢迎,我又将眼光投放到更广阔的艺术空间。

剪纸是民间广为流传、广受欢迎的文艺样式,我想将“贱三爷”故事同剪纸嫁接,这样既可以让剪纸因“贱三爷”故事更有内涵,又可以让“贱三爷”故事因剪纸而更加丰富。就这样,我通过东北的一家剪纸厂完成了50幅以“贱三爷”故事为内容的剪纸作品。

同时我又将“贱三爷”故事同风筝艺术嫁接,选取129篇“贱三爷”故事,以漫画形式绘在红、黄两条各长近70米的龙型风筝身上,呈现出“二龙戏珠”的形态。我还将“贱三爷”故事嫁接在木偶戏上,通过木偶剧的形式表现贱三爷惩治地主老财、戏弄贪赃枉法县官的故事。

这些作品在“文化遗产日”上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我今年已83岁了,很多人问我,你还能“贱三爷”做些什么吗?我的回答是,能的,我还要将“贱三爷”的故事与更多民间文艺形式结合,用大家最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贱三爷”的故事。

沈远义,“贱三爷”故事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宋艳,蔡甸区文化馆非遗办公室主任

让每一份提案都掷地有声

◇ 程 祯（口述） 郑雅飞（整理）

人物名片：程祯，市政协委员，武汉粗茶淡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支部书记、工会主席。

我于2012年被推荐为政协武汉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已连任三届，履职十年。这十年来，我郑重对待政协委员这一头衔，不愿辜负党和群众的期待，每年集中精力、深入调研，至少写好一份提案。对于政协委员来说，提案是有严格程序的民主形式，是严肃、郑重的政治行为；是赋予政协委员法定的民主权力，是协商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受到尊重和保护保护的。而且，提案的最终程序是办理，这就是说提案是要有结果的，所以提案是政协委员手中有一定约束力的参政手段。写好提案，让每一份提案都有分量，是政协委员的必修课。

切口要小，靶向要准

政协委员的提案就像手术室里治病救命的刀子。刀子必须快，不能迟钝无锋，切

不进去；但切口要尽量小。大刀阔斧是解决问题，精确手术也是解决问题，后者对病人的副作用更小，治疗也更有效。

2012年，我刚进入市政协时，受到老委员的启发，从身边寻找提案线索，小切口、深调研。当时武汉市的公租房建设刚刚启动，在洪山区开始试点，仅有331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及新就业职工申请。

我作为武汉粗茶淡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在广大基层员工中收集意见信息。其中，大部分人反映政策在资格准入的条件上设置较高，很多有急切住房需求的人无法申报。此外，补贴标准偏低；房源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房源户型单一，不能满足不同人口结构家庭的需求；宣传不够，了解政策的市民不多。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很多市民没有申请公租房，仍然承受着高房租的巨大生活压力。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这些情况，我写了《关于加快公租房建设的建议》的提案，提出了6条建议。从政策支持的角度考虑，我建议政府加大公租房建设的政策支持

和资金投入，完善公租房房源布局，科学设置和规范申请程序，加大宣传与引导。在租赁者的申请和审核等方面都要建立完备的制度，一定要坚持“三公”原则。从扩大房源的角度考虑，我建议由政府出面成立公租房租赁公司，鼓励国有单位、产业园区和社会单位可利用自有土地建设公租房，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建设土地建设公租房，引进民间资本让开发商参与公租房建设等，期望公租房建设多点开花、多地布局，便利城市各个角落的务工人群。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的提案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武汉的几家报纸也给予了报道。在加快公租房建设这样一个小切口上动刀，瞄准的却是保障职工住房、提升生活幸福感的民生大事。这一份提案的调研、整理、提交和答复，使我感触很深。这些年来，武汉市在不断出台各种政策，改善老百姓们的居住条件。在这件事上，我还能做些什么努力？时隔十年，我于2022年1月的“两会”上，再次提出了相关提案。

愚公精神，久久为功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干事创业需要有愚公精神，始终咬定目标、持之以恒，在积跬步中行至千里，在积小流中汇成大河，我作为企业家、工会主席是这么做的，作为政协委员也是如此。群众反映的问题没解决，或是没彻底解决，那就找到症结所在，再提一遍。《关于外来务工人员住宿难问题的建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发展迅猛，大量从事服务保障行业的务工人员在汉



2021年两会联组座谈会上发言

工作和生活，如餐厅服务员、物流快递员、家政人员、建筑工人等，这些务工人员住宿难问题成为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招工难”“留工难”的瓶颈问题。我们要积极推进武汉城市发展建设，也要响应党中央“共同富裕”的号召，要更加关注为武汉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务工人员的生活品质。

总的来说，新提案延续了2012年《关于加快公租房建设的建议》的思路，但对于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考虑更加周全。

例如，建议统一规划建设外来务工人员专用“蓝领公寓”，由政府在各工业区、开发区，或是外来人口相对集中、工厂比较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专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廉租房，并对这些房屋进行集中管理，定向出租给没有条件建造集体公寓的企业，或是直接出租给具备一定条件的外来务工者，比如已经连续工作一年以上、无固定居所者等。这一点，收到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答复，在《武汉市外来务工人员公租房保障暂行办法》中已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并且2020年出台的《武汉市



2020年抗疫期间为社区工作人员生产快餐盒饭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进一步完善准入条件，优化补贴档次，扩大保障范围。“蓝领”人群的住房问题将得到更多改善，这是政府办实事的最佳例证。老百姓“说了不白说”，政协委员的提案“提了不白提”，十年来，武汉的改变有目共睹。

提案要准，办理要实

“提”和“办”恰似提案工作的双翼，缺一不可。提得准不准，反映的是政协委员的参政水平；办得好不好，检验的是党政部门的执政能力。这十年来，我广泛联系基层群众，聆听他们的心声，在租房住房、食品安全、幼儿教育、交通出行等民生问题上提出多条建议，多件提案获评优秀提案。但对于这些提案的办理，并不能尽如人意。目前，提案办理质量不高的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个别承办单位强调客观困难，注重形式，不注重长效机制的建立，存在敷衍应付的思想，有些答复答非所问、避重就轻，委员往往是被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

我在《关于改进提案办理质量考核方

法的建议》中提出改进提案办理质量评价体系，组织多方（提案人、政协提案委、案由所涉及的单位或者个人等）对提案质量打分评估。不是简单地回复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来概括整个办案效果，提案人要从不同方面如办案态度、办案效率、办案质量等多方面进行单项评估，这样办理提案的真正效果才能得以体现。

市政协对于重点提案开展的“回头看”工作，效果很好。

但重点提案每年只有那么几件，且议题较为宏大，需要同类的普通提案具体支撑。能否对这些普通提案实行办理“后评议”制度呢？开展提案办理效果回头看，对提案办结后进行跟踪反馈，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改善少数部门办理提案“重答复、轻落实”的状况，要有督办机构检查落实提案办理情况，请相关人员（包括提案人）参与提案办理结果的回访和二次考核，将提案办理效果真正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考核。

政协委员说到底是个“良心活儿”，是群众的代言人，群众的呼声能否被听到、生存状况能否得到改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委员提案的分量和质量。一个职工及其家庭的幸福有多重？社会正义、人本主义的价值有多重？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意义有多重？每当我想到这些时，一种无法衡量的分量自然沉甸甸地落在了心头。满载着人民的期许，我写下一份份提案。同时我希望我的每一份提案，都能掷地有声。

乡村振兴路上的“她力量”

◇ 李菟菟

人物名片：李菟菟，市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处处长、市政协委员、市妇联执委、省市青联委员、民盟市委委员及农业与城乡建设委主任。

“她力量”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呢？担任市妇联执委期间，聆听到的诸多巾帼模范创业奉献故事，我感受到了“她力量”的坚韧与强大。五年前当选市政协委员，参与市政协组织各项调研活动，与各界代表性人物尤其优秀杰出女性委员商讨、交流，我更意识到“她力量”的用武之地——不止家庭、教育，新时代女性，红妆武装皆相宜，可以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做群众的代表、城市的规划师、社会的先锋队。

农业农村，在大多数人眼里是男性施展身手才能的领地，面朝黄土背朝天、风吹日晒雨淋的艰苦，在常人眼中，貌似不是女性柔肩能扛。而我作为万千女性的一员，

作为市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处干部，在扶贫开发、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里，与千千万万男性战友比肩而行，立志展现不一般的“她力量”。

温和倾听的力量

对于成长在都市的一名“80后”，要想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推动者之一，首要的是学会倾听。要听市委市政府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导向、部署安排，听委员代表们反馈的意见、建议，更要听当地人讲当地话，“知民意方能解其困”，和农民唠嗑，成为朋友，他们才会把心声说与我们听。

为此，无论晴雨，一年有大半时间，我都驱车前往田间地头、乡村田野、农户家中。“不爱红妆爱休闲”——一身体闲装、一双运动鞋，是下乡的标配，裤子鞋子在泥泞路上一身泥也是常见。有几次车子陷到田

埂子里，多亏了老乡帮忙抬。倾听时，“她力量”有着如“水”般的优势——老乡们愿意与女干部交谈，尤其留守女性、老人、孩子更是有天然的亲切感。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我也在一次调研中拉近与老乡的距离，了解掌握他们的“急难愁盼”。

“要想富，先修路。”在政府帮扶下，我市公路已实现“村村通”，四好农村路解决了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高标准农田、正规化农产品基地建设不断扩大，农村水利灌溉设施不断完善，农业产业发展条件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善。然而，2018年，我和市政协委员、农业战线的干部们在新洲、黄陂等地开展调研时，一些老乡却反映一些小农水项目设计建设不实用、缺乏维管甚至导致废弃，一些农民宁可肩挑手扛打水灌溉，也不去用基地里的沟路渠灌溉设备。问及原因，农民说，不是不想用，但闲时长时间不用，等要用时淤堵已很严重。清淤工程量太大，一些灌溉设备也锈蚀损坏，现在抛荒的多。村里要是不管，自己为种的零零散散的田去修，不划算。农民的话语质朴，但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财政投入建设的部分水利项目没有利用好，没有最大程度给农民带来便利实惠的问题。

结合这一情况，我和委员、同事们加大调研，深入了解当前农村农田水利发展的问题。通过咨询专家，提出了对农田水利发展、维护方面的对策建议，并提交到市民盟和市政协经济委。提案一经提出，就引起了重视，大家结合自身行业领域和专业知识，就加快武汉市“智慧水务”平台建设、切实加大农村水利设施建设投入等课题再次进行了深入探讨。2018年7月、8月，在万勇市长与委员对话座谈会及市政协常委专题



2022年两会上发言

协商会上，我与市领导面对面建言献策。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相关部门的给力办理下，各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大为改善，并逐渐建立完善小农水维保制度，明确专人进行日常管理。村民农田灌溉更有保障，不论生产还是生活都便利了许多。

数次下乡中，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好产业，留不住人，引不来客，只能一年比一年穷！”2017年初，时任市委书记陈一新在江夏区小朱湾调研时提出了“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三乡工程”，即让优质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发展产业，通过产业兴旺、乡村面貌改变，引导更多市民来农村创业、休闲、养生，实现良性循环，推动乡村发展。在市政协副主席梁鸣带领下，我们对江夏区山坡街和新洲区旧街这两个贫困村适宜发展的产业进行了调研。其间，我和专委会数位委员一同吃住在贫困村，走村串户慰问贫困户、听取诉求，开展政策落实问卷调查，与街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困难群众座谈，最终选定了猕猴桃产业、白茶基地建设等扶贫项目。

通过政协广泛影响和号召，我们引进了业主，引入了资金。结合农业农村局推出

的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采取更高效率的林间套种技术，既打造猕猴桃示范种植基地，同时陆续建设了一批猕猴桃、白茶休闲采摘观光基地。根据在推动贫困村发展产业时的所见所闻，结合自己的思考，我先后参与并提交了关于深化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推动农产品市场流通等一系列提案，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夯实农村稳定脱贫、持续增收的产业基础，让贫困户彻底拔掉“穷根”。

坚定发声的力量

2016年，汪洋副总理亲自启动了中国社会扶贫网项目。在国务院扶贫办的指导下，中国社会扶贫网提供扶贫对接、扶贫众筹、扶贫商城、扶贫展示、扶贫新榜样五大功能，引导社会人士对接贫困户的需求。

当前，我们社会不缺少扶贫济困的爱心和力量，缺的是有效可信的平台和参与渠道，中国社会扶贫网恰好成为链接贫困户和社会力量的纽带。“利剑”还得配好鞘，贫困户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接触过互联网，如何让他们学会上网并通过网络发布自己的需求，触发爱心对接帮扶？

我预想到推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重重阻力，但没想到真推广起来，比我想象的更难——一些贫困户没有智能手机，新推广的平台难注册、难使用……

困难没有击退我，我决心利用好“互联网+”的力量去引导社会爱心来帮贫助困。首先，是最广泛地发动与贫困户联系最

直接、最紧密的驻村工作队员，让他们去引导贫困户在网上发布帮扶需求，让他们去帮助这些贫困户接触互联网，在社会扶贫网平台上发布他们实现脱贫致富的一个个小心愿。

我尽最大努力，向市民们宣传这个爱心公益平台，将贫困户的需求置于聚光灯下。在我们的奔走下，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和体操世界冠军杨威为网站站台，拍摄扶贫济困公益宣传片，分文不取。为了扶贫公益，八十高龄的傅廷栋院士冒着酷暑，在油菜地里取景拍摄镜头的画面，让我铭刻心间、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

宣传片在武汉电视台、武汉地铁上播出，一时间引发了社会爱心对接热潮。在号召下，市妇联界别姐妹们积极响应，赴新洲现场面对面为贫困户解难纾困；社区网格员动员市民们在网上平台对接贫困户需求捐赠物资；政协全会期间，我们倡议全体委员注册成为社会爱心人士，精准奉献爱心；通过联合组织部、团委等各部门，广泛发动党员、共青团员、高校师生们，通过积极对接平台上的需求，奉献爱心。



2019年在新洲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深度思考的力量

2018年，围绕市政协重点提案《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议》办理，委员们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多年来的扶贫工作经验告诉我，扶贫不仅要发展产业，更关键的是要改变贫困户的“等靠要”的思想，扶贫得先扶志。

当年7月，市扶贫攻坚办专职副主任张百香带领市区扶贫系统一行20余人，赴团风县调研。当地用捐赠物品建设“爱心超市”，专门为贫困户提供爱心物资，这一做法启发了我。我思索着：能否将团风县的“爱心超市”成功经验移植到武汉市贫困村呢？根据团风经验，结合武汉实际，我精心策划了开设“爱心超市”、扶贫又扶志的工作方案，并在江夏舒安、黄陂同心集村展开首批试点。连续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周都自己驾车前往一百余公里开外的木兰乡同心集村、江夏区舒安村，与村委会、工作队一同研究推进爱心超市的积分设置、换购规则、物资来源、产品定价等建设工作。

“爱心超市”以“爱心”开头，不以盈利为目的，充分体现“爱心扶贫、用行济困”的初衷，为社会各界关注扶贫、奉献爱心提供了又一平台。我积极与企事业单位、社会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沟通协调，鼓励社会各界通过定点援建、冠名等方式，参与到“爱心超市”的建设和管理运行工作中来。

“爱心超市”实行积分卡制度，贫困户可以采取劳动表现挣积分，积分累计换物品的方式，激励贫困户通过参与发展产业、劳动就业、环境卫生、政策掌握、集体奉献等评比活动，获得积分奖励，累计到一定标准，即可到超市换购物资。

“爱心超市”让脱贫致富行动在这里开始，积分易物不仅为贫困户送去财和物，还送去“志”和“爱”，被广大贫困户有尊严地接受，克服了惰性贫困户“懒汉”思想，激发了他们自身脱贫的信心，让脱贫成为共识，让“比着干”成为常态，有效催生了贫困户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2018年9月，武汉市首批“爱心超市”在江夏、新洲、黄陂、蔡甸四个城区纷纷成功运营，一个月后，全市首家开业的爱心超市——江夏区舒安街八秀村“爱心超市”内，全村22户贫困村民用“劳动积分”，累计兑换了1809分的食用油、大米、卫生纸、牙膏、牙刷、脸盆、洗菜篓等物资，拿着用积分兑换的生活物资，村民个个眉开眼笑甚是欢喜，被中央、省市各界媒体竞相报道。

我既是“三农”战线的工作者，也是一名普通的武汉市民。从生到长，我热爱这片土地，热切期盼武汉的明天更美好。成为委员，即代表武汉市民，代表全市的女性同胞们，理应为这个城市的发展贡献来自女性的力量。

在《政协论坛》节目中，我先后参与探讨了幸福武汉、精准扶贫、粮食节约等话题。尤其在“生活在武汉，你幸福么”这期节目中，我认真思考了作为一名武汉市民，这些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我们的城市更美了，乡村环境更好了，交通更畅达了，物资更丰富了，市民的“钱袋子”更鼓了……这一切的变化，凝聚着这座城市所有建设者的努力和心血，而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只感到无比的荣耀、无比的自豪！

我的人生格言是专注和创新

◇ 常发文（口述） 田 勇（整理）

人物名片：常发文，红鼎豆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市洪山区政协委员、中国饭店协会海鲜专委会副主席。

我做了 30 多年餐饮，一路走来我坚定认为，做一件事一定要全身心地专注和投入，并能做到跟随时代发展不断创新。

从打工到自己创业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正因为蜀道难，“走出去”在四川人心中愈发强烈。1986 年，我 18 岁，从四川巴中到成都的一家火锅店当伙计，一干就是 7 年，从杂工做到经理。

1993 年，我受邀来到武汉，负责一家大型火锅店的经营和管理。在武汉，我先后担任过神龙火锅和红日火锅的执行总经理，当时火锅店每天排队候位。

经过 10 多年的磨炼，我愈发了解火锅业，也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我也有自己的梦想。

2000 年，我自己创立的川味火锅店开张了。

彼时麻辣火锅店在武汉街头已比比皆是，口味差不多，装修、服务也是大同小异。虽然我的火锅店生意很好，但我感觉这样下去不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碰到天花板。

于是我开始到各地进行调研、考察，想在业态上有所创新。终于，2006 年的澳门之行，激起了我探索新事物的劲头。

豆捞在澳门非常受欢迎，这种底汤清淡、少盐、少油，将海鲜和火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和麻辣鲜香、重油重盐的川渝火锅完全不同。那时我认定，豆捞不仅会激起食客的新鲜感，也更符合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需要。

创立海鲜火锅品牌

武汉作为内陆城市，海鲜是个“奢侈品”。2007 年，武汉市场上的海鲜大多是冰冻的，海鲜不鲜。那时的武汉不仅没有海鲜火锅，连售卖海鲜的餐馆都屈指可数。

麻辣带来的味蕾刺激受到消费者喜爱，

武汉的市场上多是麻辣的火锅，但并非所有地区的消费者都喜欢吃辣。武汉这座城市因“九省通衢”的地域特点，长期以来南来北往客人如同流水，造就了武汉人极其开放的口味习惯。海鲜火锅这一新事物，我想应该是有市场的。

对于海鲜火锅的定位，我有自己的想法，既然要做就要保证食材的原汁原味，锅底要用“醇正的鲍皇汤”，食材要用“生猛的活海鲜”。

2007年6月，红鼎豆捞第一家店在武昌街道口开业，1500多平方米的门店，装修大气、高雅，进餐方式也采用更卫生、更讲究的单人单锅，跟我以前经营的麻辣火锅店来了个180°大转弯。

为了得到醇正的锅底，以衬托海鲜食材的原汁原味，我高薪请来港澳名厨主理汤底。但我还要解决最要命的问题——食材。由于海鲜火锅和川渝火锅的极大差别，我之前积累的供应商、供应链体系，几乎都派不上用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我带着团队到烟台、青岛、北海、广州，一家家供应商去跑，一个个海鲜基地考察。找食材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有时为了一种食材真的是废寝忘食，为了保证海鲜的鲜活度，我经常凌晨三四点到基地去挑最新鲜上

岸的食材。

找食材的难处不止在于找不到，更在于找到了顾客是否接受。你找到100个好食材，给顾客尝试以后，可能最后只能留下三四种。有时花很多钱，不一定有收获，大家说我对食材太过执拗，在我看来做企业有舍有得，对食客而言好食材是餐饮企业最大的诚意。

至今我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只要听见哪儿有好食材，立马就坐飞机到现场去确认。只要是好东西，立马下定，拿到店里接受食客的检验。

红鼎豆捞致力于天然健康的海鲜火锅，定位是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群体服务，高品质不是高价格，而是一种生活的价值观。高品质的食材，才能让顾客享有高品质的就餐体验。虽然人均消费价格略高一些，但得到了顾客的认可，量自然就起来了。第二年就开了新店。到2014年，红鼎豆捞的直营连锁分店达到6家。现在基本上是一年开一家新店。

如今，红鼎豆捞在武汉已有11家门店。我们的海鲜食材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采购，全程空运，确保新鲜。

坚持做高品质餐饮

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红鼎豆捞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没有盲目转型，而是更坚定做高品质餐饮。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高品质一定拥有市场，商务宴请、白领聚餐、朋友聚会、小康家庭用餐，这些品质人群才是高品质餐饮消费的主力军。

于是，我重新梳理了产品的结构。增加小海鲜的比重，减少大海鲜的比重，并将一些价格过于昂贵的进口肉类，更换成价格



中国500强门店：汉街店

更适合的优质肉类。同时，优化菜品结构，增加品种。

其次是把服务方式做了转向，用贴心、细致的服务带给顾客更多惊喜，以彰显自己的品质。吃过小火锅的人应该都有印象，因为每人面前都要有电磁炉，所以基本桌子都是没有桌布的，但没有桌布不仅显得不卫生，影响就餐环境的品质，而且玻璃面板让人感觉冰冷、坚硬。为此，我专门找厂家订制可以铺上桌布的火锅桌，就要给食客带来高品质、柔软而温暖的感受。

用这样的方式，红鼎豆捞不仅稳住了原来商务用餐的客人，还拓展出比原来客群更广的白领、亲友、家庭聚餐顾客，营业额和人数逆势增长。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武汉所有门店关停了3个多月，损失惨重。我一边下沉到社区当志愿者，一边思考怎样渡过难关。4月8日解除管控，我立即组织店面开启无接触外送服务，加大线上外卖力度。4月27日起，武汉逐步恢复堂食，我一边严格把控食材的品质，一边把“一人一锅分餐制，高温鲜煮更健康”的特色理念传递给顾客。很快公司所有门店的业绩逐步恢复，走上正轨，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我很感谢顾客们的信任，这也得益于企业一直以来对食材高品质的坚守，得益于顾客对品牌的高度认可。

当下后疫情时代，疫情反复让我们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但企业一直在稳步向前发展，仍在不断拓展新门店。

坚守初心创新前行

一路走来，企业先后获评“湖北省著名商标”“国家五叶级绿色饭店”“国家五

钻酒店”“武汉最具人气的餐饮品牌”等数十项荣誉，成为武汉的一张餐饮名片。

2016年1月，红鼎豆捞在新三板挂牌，成为中国海鲜火锅第一股。

在挂牌新三板后，我和团队进一步突出“海鲜火锅”细分品类定位，走差异化经营发展路线，打造了职业经理人团队，建立健全了标准化体系。同时还加快拓展直营门店，围绕提高顾客体验不遗余力开展工作。

通过店面不断拓展，企业不仅夯实了产品和服务基础，同时在品牌的知名度、品牌文化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我时刻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环境创新、体验创新、理念创新。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能保持品牌的生命力和不断发展的潜力。

2022年，红鼎豆捞迎来15周年庆，11家门店成为不同区域的地标餐饮门店，最大门店近5000平方米，最小的1000多平方米，总营业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其中汉街店是中国500强门店。

15周年庆之际，我把企业的战略定位和理念表达做了创新，以“全球海鲜，武汉风范”作为产品定位和价值定位，以“红尘有你，红鼎有礼”作为情感表达。希望通过最好的产品、最贴心的服务，来提高大家的就餐体验，表达对大家的爱和尊重，让顾客获得更高的价值感。

未来5年，企业将在一线城市和周边省会城市拓展直营门店。同时，拓展新零售业务，打造企业资本生态链条。

15周年，企业还很年轻，只要坚守初心不断创新，努力前行就会拥有无限可能。

匠心营造 智慧生活

◇ 王升洪（口述） 严 濂（整理）

人物名片：王升洪，武汉盐城商会会长，武汉海太欧林智能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昌区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武汉轻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校友会会长。

古往今来，至臻精品，皆以匠心雕琢、诚心运营。我本是个大学里的教书匠，精心育人是我的初衷。现在我经营企业，匠心不改，力求将智能植入家具，让智慧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为师与用人 异曲同工

1987年，我考上了武汉轻工大学，来到了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毕业后我决定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过教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校园的生活至今让我难忘，但当时的我

就像家乡盐城的候鸟一样，总想飞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趁着90年代的下海潮，我辞去了学校的工作，带着仅有的几百元积蓄前往深圳寻找机会。

刚到深圳的那晚住不起昂贵的宾馆，我就将报纸铺在深圳大剧院外的草坪上，睡了一夜。当时年轻力壮也不知道累，我一连找了三份工作，分别是广告公司业务员、食品保鲜公司业务员和电子公司市场专员，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虽然工作初期也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凭借着诚信为人和做教师锻炼出来的口才，我手中的业务越做越多，事业渐渐进入了正轨，同时积累了人脉资源和资金。有了原始资金积累，我开始考虑独立创业。

2000年9月，我回到武汉，创立了武汉海太欧林智能家具有限公司，主营办公家

具的设计、销售和服务。公司创立之初，在武汉市场没有影响力，整个公司算上我自己也只有4个人。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接到一笔为某商店安装地板的订单。由于客户的门店近日要开业，为了赶在开业前把地板装好，我安排工程队昼夜赶工，以期尽快把地板装好。然而就在地板装好的那天夜里，我突然接到工程队长的

电话。他在电话那头慌张地说对方水管有问题，地板全部被水泡了。对他的话我表示质疑，一再追问之下，工程队长才说出了实情。原来夜里收工时，有工人洗手忘记了关水龙头，等发现时已经是凌晨，刚刚装好的地板全部被水浸泡。

当时工程队长悄悄跟我说，这批地板成本很高，不如就把责任归咎为对方的水管问题。我想都没想，断然拒绝了工程队长的“馊点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承担责任。我告诉工程队长，对别人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并当即向客户坦诚了事实，承诺全额赔偿。

我安排工人把家具搬出来以后，将原先铺好的地板全部撬掉，然后把水抽干，用电风扇吹了一天一夜，重新铺了新的地板。就这样，赶在客户开业前一天把工作全部做完。因为我的真诚和坦率，客户赞不绝口。此后，他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业务。

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能力是基石上的砖瓦，有了这二者在前，团队协作才能把事



2018年王升洪在公司年会上致辞

情做好。当老师的经历，让我练就了识人的好眼力，首先看人品，其次看学习能力，最后看协作精神。现在公司用人，我依旧遵循这三点原则。在我看来，这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研发与销售 相辅相成

办公室里我最喜欢的家具，当数智能化办公桌。它可以根据我的需要，适时调整高度以应对不同的办公场景。对于坐办公室的人来说，“健康办公”和“智能办公”是一种更先进的办公理念。如果希望别人喜欢一样东西，首先得自己喜欢，家具也是同理。

记得有一次，武汉某银行委托我们公司订制一批高档座椅，客户提供了设计图纸，要求按照图纸进行设计制作。我看了图纸后，发现照此生产出来的座椅容易损坏，并将这个顾虑告知了客户，可他们非常喜欢自己的设计，仍然坚持依照图纸来做。

果不其然，一年之后我担心的事情还

是发生了，这批座椅纷纷损坏。依照之前的协议，座椅发生损坏生产方概不负责。但我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把所有出现问题的座椅召回，并免费替换成新座椅。我当时就是觉得，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是从我的车间里生产出来的产品，即使亏本我也要对它负责。我的解决方案让客户公司的负责人非常感动，当即与我签订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

由此也引发了我的思考，研发与销售，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能研发出更多既符合客户喜好又经久耐用的家具，其实也能从根本上推动销售，进一步扩大市场。小到一块能够静音的办公地毯，大到整屋能够吸收甲醛的环保涂料，科技的力量一直在闪闪发光。“匠心研发”才是“有效销售”最有力的支撑。

2015年8月，作为湖北省优秀青年民营企业家的我，参加了由湖北省商务厅组织的经贸代表团出访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国考察。考察回来后，我发现，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趋势，所以未来医疗和养老将会是市场的发展方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院的建设需求越来越大，伴随更新的家具体量也越来越大。如果能有一套流畅的家具动线设计，就能在最短的距离里节约医护工作者的时间。从医院的公共区域里的排椅到护士站里诊断桌，再到医生办公室里的智能诊断床，每一个环节里的智能家具都能发挥它的作用。时间就是生命，节约时间就是珍惜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医疗智能家具的研发就更具价值。专注于智能办公家具、医疗养老、教学科研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是我们企业的核心。

工厂现与多家欧洲优秀设计机构合作，成立了家具设计研发中心，目前拥有三大生产基地：华东生产基地（南京）、华南生产基地（广州）、华中生产基地（荆门）。并先后与德国 Vitra、挪威 Flokk、意大利 Fantoni 等世界著名企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立足国内走向世界。

面对科技需求日益增长的未来，致力于为中高端客户提供专业的办公空间整体解决方案，是我们企业的方向。我们的公司不设卖场，以展厅形式为主，靠的是前期设计，只保留一些常规的产品，几乎零库存。故而研发中心、工业设计中心、运营中心、市场中心这一系列的部门所发挥的作用都非常重要。我



2019年王升洪为员工授课

们的公司已经拥有 150 多项发明专利，还有中国唯二的国家级科技研发实验室。知识就是生产力，创新才能求发展。

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武汉海太欧林智能家具有限公司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从 2001 年公司在湖北推出 ONLEAD 品牌起，经过 10 年的摸爬滚打，2011 年公司已然成为湖北市场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办公家具企业；2012 年，为了给更多客户创造美好的办公空间和生活环境，公司在四通八达的凤凰山创办了第一家子公司——武汉欧尚；到了 2015 年，我们的团队持续着裂变式的发展，旗下独立运营七家子公司。经过 20 年的拼搏，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经拥有了 8 家分公司和百余人的团队；销售业绩稳居行业前列，公司连年均纳税约 150 万元左右。

企业与商会 齐心协力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分子。社会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一份社会责任，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在尽责。企业与商会，就像分子和分母，齐心协力才能共创佳绩。

作为董事长，要善于换位思考，为公司的每一个员工着想。

每逢传统节日，公司都会及时为员工赠送时令食品。遇到员工过生日，公司都会按季度举办一次集体“生日会”，员工聚集一堂，品蛋糕，吃水果，为“寿星”祝福。公司还长期有下午茶的习惯，连一楼保安都说，海太欧林员工真幸福。这 5 年来，有 11 位孕妈享受了公司的孕期补贴和细致入微的复工政策。公司无论哪位员工住院看病，领导都会率工会、党支部一起，第一时

间前往看望。以身作则，2015 年 11 月我带着公司领导层和支部全体党员，前往通城县四庄乡捐助 10 万元，帮扶 5 户特困家庭修缮危房过春节。

公司的关怀和义举，员工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体现在行动上。每次迎接客户，员工都会用“六个一”来回报公司：一张笑脸相迎、一声你好问候、一把椅子让座、一杯茶水解渴、一片热情办事、一语再见送别。客户真切感受，来到欧林，宾至如归。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于每个企业而言都是一次大考。从 2020 年 1 月 27 日开始，我亲任公司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公司全员实行“健康日报”制度，每一个员工每天都须如实汇报个人健康情况。百余天里，公司发出 16 次通告、安排在线 48 课时的业务培训、组织 5 次全员参加的视频工作会议，坚持召开每周六上午的“领导小组”视频碰头会。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公司既全面掌握分散各地员工的情况，也较好地起到了稳定员工情绪、凝聚员工心力的作用。公司党员、员工积极开展捐款捐物活动，我个人捐款 7.76 万元。

2021 年 11 月 26 日，武汉市盐城商会成立。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依旧有 100 多家盐城籍在汉经商企业加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们在这个相对比较困难的时期坚持成立商会，为的就是抱团取暖、互帮互助。作为武汉盐城商会的创始会长，我会带领商会秉承“厚德、坚韧、圆融、创新”的盐商精神，坚持“按章办会、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的办会宗旨，开拓进取，努力办成“小而美”的商会。

武汉民盟建言组建新江汉大学

◇ 郭友中（口述） 宋 薇（整理）

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新江汉大学获准组建，原四校（江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武汉教育学院、武汉市职工医学院）合并，武汉有了第一所市属多科性本科院校。

联合办学，时不我待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高等教育超高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国家、省、部直属的高校，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与之相较，多数地方高校基础差、底子薄、财力不足，办学条件长期达不到国家标准，自身发展受限。

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之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再次出现了高潮，且有了新的特点：本科生、研究生的需求上升，开



郭友中

始出现学历竞争。大城市高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强烈，因而升学矛盾尖锐。武汉虽然高校林立，但却没有一所市属本科院校。武汉的高考分数线一直处于全国最前列，升学率

低。而北京、上海等城市，地方高校规模较大，升学率高，情况就好一些。

因此，地方高校的发展又迎来了又一个浪潮，其特点不在数量上，而是在质量上，即目标是提高地方高校的水平 and 档次。武汉处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囿于武汉当时的实力，要实现这一目标，联合是最现实的途径，组建高质量、高水准的联合大学成为当务之急！

早在1989年，我担任武汉市政府副市长，分管高等教育；同时还担任民盟武汉市委主委，民盟成员大多来自科技教育与文化界别。武汉要发展，一定要千方百计创建一所新型高水平的一流联合大学，我们自觉责任重大，责无旁贷！

矢志不渝，十年磨剑

我找到当时的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胡照洲，说：“有一件事很重要，但是可能难度很大。我建议武汉市成立联合大学。武汉市有6所地方大学，都是我们自己的大学，在国家没有挂上号。

武汉这么一个特大城市，一定要有一所国家挂号的大学。我想把我们的力量整合，建立一所联合大学。”

他说：“那怎么联合呢？”

我说：“需要找一块地方，至少一千亩。”

他笑了，说：“你真是开玩笑，谁能一口气给你一千亩地，让你办联合大学？可能办不到啊。”

我说：“武汉市高等教育要发展，必须走这条路，迟早都要走这条路！晚走不如早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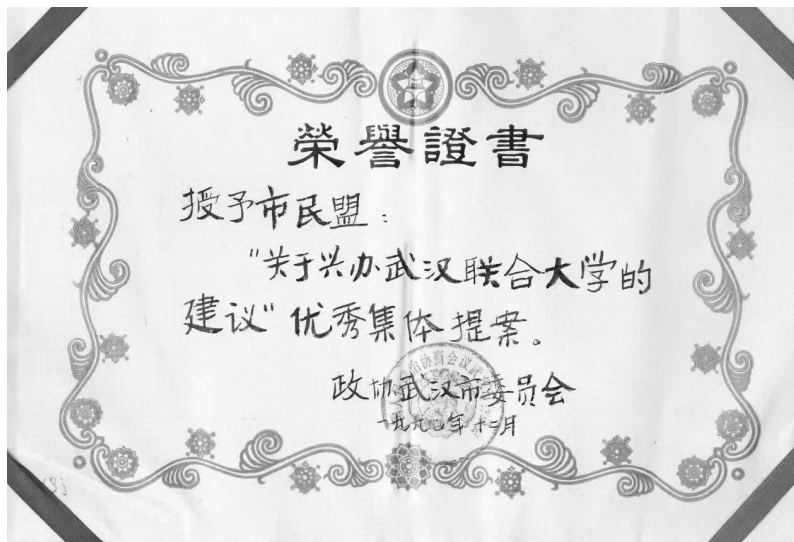
1989年，我开始利用自身资源，请政府及民盟的专家进行调查研究，在民盟内部更做过很多次讨论和报告。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构思，把这6所地方高校再加上力所能及的一些资源，办成统一联合的大学。

1990年，调研报告送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们高度重视，给了我们民盟非常大的支持。

1991年，我代表民盟武汉市委以党派的提案形式，向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提出《关于建立武汉高等教育开发区，兴办武汉联合大学的建议》。

1992年到1999年，我们先后提出了《关于兴办武汉联合大学的建议》《关于振兴武汉联合大学的建议》《关于建立武汉联合大学的再建议》等提案。

从1989年到1999年，我们坚持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我们通过不断调查、研究、补充，强调建议的必要性；从土地选址、资金预算，到办学规模、院系设置，强调建议的可行性。我们提出，要下决心办



市政协授予市民盟的荣誉证书



新江汉大学校园

成一流大学——聘请一流校长、造就一流师资、建设一流平台、精选一流院系、培养一流学生。到第十年的时候，不但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还对我们整个方案高度称赞。

最后，机遇来了。武汉市委、市政府利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颁布《国家高等教育法》的机遇，研究采纳了我们的建议，确定建校，成立筹备委员会，开始建校的筹备工作。

“民盟的提案了不起！”

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武汉市反复论证后投资8亿元，择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畔，建设新江汉大学校园。

2001年10月17日，教育部向湖北省政府发文，原四校合并正式组建新江汉大学。自此，武汉有了第一所市属多科性本科院校。

新江汉大学，已不是占地1000亩，而是2200亩，有文、理、法、艺、体、生、医、化、

环、机电、计算机、物理信息等16个学院，在校师生近2万。特别让我与民盟的朋友们感慨的是，新江汉大学基本实现了我们的提案，包括规模、选址与院系设置。

胡照洲同志向市领导说：“为了武汉联合大学，也就是现在的新江汉大学这件事情，民盟整整努力了十年。

我们党派的同志，认准了一件事之后就锲而不舍，最后一定要搞出成绩，令人可敬！对郭友中教授，这么全心全意干这件大事、这件我认为办不到的事，他最后办成了，而且办得这么漂亮。民盟的提案了不起！”

我觉得取得如此成绩，离不开两点：

第一，一定要坚持。这个提案从提出到实现，我们坚持了十年。利用好每一个平台、载体和渠道，发挥提案的最大力量，把参政议政做到了极致；

第二，离不开政府和统战部门的支持。民盟之所以能够做成事，除了盟员自己的努力，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和帮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历任统战部部长的支持。他们经常参与省市政府部门的会议，有很多事情，离开他们就做不了。

郭友中，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民盟武汉市委主委；宋薇，民盟武汉市委三级主任科员

在章开沅先生身边十七年

◇ 刘家峰

2021年5月28日清晨，章开沅老师在武汉安详离世，离7月8日95周岁只差40天。按传统说法，章老师一生称得上“寿满天年”“福寿双全”，可当我从微信群得知消息时，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

那天下午，我给新生讲山东大学校史，因为提及与学校创办有密切关系的教会大学，引用了章老师的研究成果，还播放了章老师的照片和书影，没想到这堂课就成了我悼念章老师的方式。两小时的课程神思恍惚，讲到章老师处几近哽咽不能自己，同学们有些惊诧，我只好如实相告，画面中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今天走了。

10月20日，在武汉石门峰纪念公园举行章老师安灵公祭暨雕塑揭幕仪式，我们与章老师最后道别。老师生前强调“参与的史

学与史学的参与”，帮助石门峰公园提升辛亥革命和武汉抗战等历史纪念的内涵，公园也没忘记老师，专门辟出一块青草地让他魂归自然。

章老师喜欢小草，经常自谦“一株野草”，称小草虽然“渺小之至，也平凡之至”，但其“生命意志何等刚毅，何等充盈，它用亿万群体的集体苏醒，萌发出漫山遍野的新绿，一片又一片为大地增添了春天的颜色”——这完全是老师一生奋进精神的写照。

1997年7月，蒙章老师和马敏老师不弃，我有幸忝列门墙，直到2014年7月离开华师，跟随章老师学习工作17年，从青年学生成长为大学老师。如果没有章老师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恐怕我很难成长为现在的自己。对此，我永远铭感在心。

一次谈话，从此决定我今后的路

我最早听闻章老师的大名，还是在山大上大二的中国通史课上，涉及章老师和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我当时是考古学专业本科生，对章老师了解还不多。1994年秋，我考入山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对商会史研究特别有兴趣，毕业论文想研究济南商埠商会，但因为没能看成档案，最终改做“齐鲁大学经费研究”。

硕士毕业准备考博，我还是想做商会史研究，想去华师读。章老师地位太高不敢报考，就写信给马敏老师，没想到马老师表示欢迎，但建议我联系章老师做导师。马老师还告诉我，华师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将来也可以做教会大学史，希望我尽快到武汉面谈。

1996年12月17日，我从济南坐15小时的火车到武昌。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学者，不免有些胆怯，就把刚完成的硕士论文初稿和两篇习作呈给章老师，这是我当时全部的所谓“研究成果”。

章老师翻阅了硕士论文，说看上去还可以，能用本地档案材料很好，但齐鲁大学还有很多档案在耶鲁，你还没机会看。随后又告诉我，美国鲁斯基金会出资，把耶鲁所保存的中国13所教会大学档案做成了缩微胶卷三套，一套耶鲁保留，一套给香港中文大学，还有一套就在华师，这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套。章老师又谈到成立不久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介绍了中心成员和正在出版的丛书，并送我最新一期《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最后，章老师给我讲了三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硕士阶段对教会大学史研究已有

了一定基础，可以继续做下去，欢迎来报考我的博士；如果你明年考不上，也可以先来中心工作一段时间；不管是读博还是在中心工作，你都要学好英语。

章老师谈话的时间也就半小时，但从此决定了我今后的路。转过年来，我和女友考博双双成功过线。不久马老师打来电话，说他和章老师考虑我俩同时读博助学金很少，打算让我先入职，保留学籍一年，学校还可以分给我一间平房。

两位老师想得如此周到，实在出乎我意料。1997年7月，我来华师报到，成为历史研究所（1998年后改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员。

一笔稿费，置办好几样家具电器

1990年8月到1994年3月，章老师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日本、台湾地区等高校任教、研究，1995年年初又作为“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7个月，与众多学人结下深厚友谊。章老师回武汉很长时间内，仍经常收到海外友人的大量来信，我在所里前两年经常协助章老师复函。

每天早上，我去办公室检查邮箱，把电邮打印出来分送章老师和马老师，然后再根据老师的意见代为回复。大部分电邮都是英文的，我以前从未写过英文信，一开始先拟草稿，然后请章老师过目修改，从句法、标点到行文格式都有改动。章老师非常注重维护与海外学者的友谊，每到圣诞节和新年，都要我们准备数十张贺卡，亲自写上几句话，签上名。章老师说，不要小瞧这张卡片，它让人感到温暖，这就是友谊。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知道章老师为什么朋友遍天下。

1997年12月正值日军“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中国教育报》想发章老师如何发现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文章,马老师指派我来写。因为章老师的大作《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对此讲得很详细,我根据这些材料很快就写好了。没几天,文章以《铁证》为题见报,排了满满两个整版,其中大部分内容是

章老师亲自翻译的贝德士材料,但作者署名却只有我。更让我不安的是,报社很快寄来6000多元,说是稿费加奖金。这笔钱,相当于我半年工资,可称一笔巨款。我想,这篇文章的资料,都是章老师一点点从耶鲁神学院档案中爬梳出来的,我不过是再加工而已,想把钱给章老师。但他坚决不要,让我拿着“改善生活”。我一再表示我不能要,章老师突然有点不高兴,我赶紧退出去找马老师,马老师说你就不要坚持了,这是章老师对你的关心。我用这笔钱置办了好几样家具电器,简陋的小平房顿时有了家的感觉。

一个“护身符”,在美国访学顺顺当当

章老师曾说,做教会大学史、基督教史研究一定要面向海外学术界,他们材料多,研究也比我们成熟。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为年轻人创造海外访学的机会。得益于章老师的推荐,我去旧金山大学、耶鲁大学



1999年作者(右一)同章开沅先生(左一)参加旧金山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议

访学,并收集博士论文的材料。

1999年10月,我以在职博士生第一次出国访学,章老师教我适应美国文化和礼仪。章老师1970年代末就出访海外,1990年代初在美国任教、研究三年多,按老师自己的说法是个“老留学生”,而我则完全是个“土老帽”。旧金山大学举办国际会议,邀请章老师作嘉宾。我比章老师早到几天,就去机场接老师,接过行李箱又想把手提包也拿过来,但老师坚决不让,还给我上了一课:在美国你不要按中国尊老的做法,要理解老年人的自尊,除非他们要求;不要给他们提包,也不要随便去搀扶他们,除非他们真有困难;可以跟在一边随时保护。一直到章老师晚年,他每天往返于家和办公室,要走很多台阶,他也从不让别人搀扶。

那天晚上会议安排了冷餐会,我跟在章老师身后,不时给他夹菜、倒饮料等,他又给我上了一课,说冷餐会意义不在吃,你看大家都在交流,你也不要照顾我,要主动

上前去找学者谈，做自我介绍，不要害羞，英语说不好也不要紧，跟人家交换个名片。

会议期间，章老师给我介绍了很多知名学者，此后他们都给我很多研究上的帮助。访学期间所到各地拜访学者或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多因为我是章老师的学生而受到热情接待。这次美国之行虽然只有短短3个多月，但收获远超我的预期。回国前给章老师写信，开玩笑式地说，您的名字就是我的“护身符”，让我在美国一路顺顺当当。

一次批评，警醒性格能决定命运

我刚工作的那些年，陪同章老师外出开会或讲演比较多。印象较深的一次是1998年春天，我和同门王薇佳陪同章老师及师母去南京大学讲学，同时也为出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与南大出版社商谈。我们去了章老师房间，发现他已早早把我们翻译的资料分门别类，在桌子上摆放整齐，等出版社杨金荣老师来访。章老师带我们把问题全部梳理一遍，这样交流起来效率提高了很多。

那时从南京回武汉，要在上海中转，卧铺票不好买，委托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代购，约定到火车站见面取票。那天清晨，我们乘中巴赶往上海火车站，由于一路下雨，抵达时距发车不到15分钟。入口处人山人海，很难发现徐老师的身影，打手机又听不见他说话，只得对着手机大声喊我们在哪里哪里。这时章老师说，别喊了，不要催徐老师，他血压高，我们大不了就在上海住一天嘛。

所幸的是，离开车还有5分钟的时候，徐老师出现了，跑得大汗淋漓，原来他去了软卧贵宾候车室等我们，又折回普通进站口

找我们。上车后检讨差点误了行程，章老师笑了笑，说以后遇事不要慌，要多替对方考虑。

我刚来研究所时，前辈老师说章老师是很严厉的，有时也发火。但我在所里十几年，感觉他对我们都很温和。只有一次，在不该我发言的论文答辩会上，因为观点不同，我言语冲撞了一位年长老师。事后觉得给章老师丢了脸，就去他办公室认错。他很严厉地对我说，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但你这种批评别人的方式是错误的，你要诚恳道歉，争取原谅。章老师又说，你还真是山东人的性格，对人真诚、言行坦率本来是好品格，但直率过度不加思考，就会变成冲动鲁莽了，这个要不得。章老师又回忆他特殊时期的经历和所见，说明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能决定命运，谈了足足一个小时。

一句哲言，激励学子独寻真知启后人

2003年底，中心的王奇生、何建明两位骨干先后北上，马敏老师又升任校长，章老师让我负起管理责任，以中心副主任的名义开展工作。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信任，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实，中心工作开展起来并不难，因为章老师早已为我们铺好了路，又不断悉心给予指导。由于他在海外的影响力，从1990年代起，鲁斯基金会、亚联董等机构连续资助，中心有充足的经费，组织系列国际学术会议、暑期班和论坛，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丛书，建设资料室，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心和交流平台。

章老师特别重视中心的文献建设，多

次叮嘱我，对西方教会档案和出版著作应买尽买。到2005年，中心所藏研究文献的种类和规模，在国内首屈一指。他强调，文献要成为天下学术公器，对国内外学者免费开放。很多资料，在有些图书馆要么不准复印拍摄，要么费用高昂几十元一张。中心文献则全部公开，免费拍摄，很多学者特别是攻读学位的硕博生受益最多，对此非常感激。这给管理带来一定压力，但我们坚持下来，因为这真正体现章老师嘉惠学林的初心。

章老师广博的人脉资源，更为中心的交流工作助力匪浅。我曾跟章老师开玩笑，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是“打章老师的旗帜以聚天下学人”。因此，中心举办的系列国际会议，总是应者云集。从2002年中心设立“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基金”讲座以来，我们先后邀请了鲁珍晞、白吉尔、巴斯蒂、钟鸣旦、梁元生、王国斌、王成勉、柯白、狄德满、周锡瑞、裴宜理等国际一流学者，担任讲座教授。他们或是章老师多年的好友，或是受章老师教益的晚辈，都以担任讲座教授为荣。

从2004年到2008年，中心连续举办五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班”，从2009年开始又举办四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青年学者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授课，青年学者和学生报名更是非常踊跃，后者中不少现在已成为研究骨干。

无论是暑期班还是论坛，都请章老师在开幕式上讲话，他每次都兴致勃勃讲半个多小时，幽默风趣，掌声不断。章老师结合



2004年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假讲习班开班

自己研究的经历，讲述教会大学史和基督教史从“险学”到“显学”的曲折发展，多次引用楚图南为戴震纪念馆的题词“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以此激励青年学子寻找自己的学术之路。

师母黄老师说：“开沅就是那种能让学生记一辈子的好老师。”罗福惠老师这样总结老师做人做事的品格：“先生处事以真，待人以诚，尤其于友人、师弟之道，有仁者之风，这是弟子们终身服膺的重要所在。”诚哉斯言！章老师离开了我们，但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鸿篇巨制，还有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这是一本更厚重的历史著作，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品味和探索。

薪火相传，学脉绵延，或许才是我们对老师最好的纪念。

刘家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墙头马上》的台前幕后

◇ 俞啟凤

1961年，陈伯华老师排演田汉先生根据元杂剧《裴少俊墙头马上》改编的《墙头马上》。剧中一双儿女，安排了我（14岁）和童金钟老师的小儿子毛弟（6岁）担任，使我有幸能和老一辈艺术家一同排练，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艺德”，懂得的是“戏比天大”。

头牌同台齐扶“牡丹花”

《墙头马上》以青衣和小生为主，两大主角李倩君——陈伯华饰，裴少俊——王晓楼饰。其他角色都是配角，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句台词，但演出者却是汉剧十大行的头牌：三生胡桂林饰李父，六外周天栋饰裴父，五丑李罗克饰家院。此外，还有著名琴师刘志雄、鼓师傅小保加盟。

用现在的话讲，这出戏的阵容“大咖云集”，个顶个都是大艺术家，在各行当独



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

领风骚。我们学习观摩过这些老师的拿手好戏，也深知他们在观众中的影响力，但他们欣然接受不起眼的小角色，心甘情愿担当绿叶，衬托一朵娇艳的牡丹花，突出陈伯华大师的艺术风采。我的师姐熊美英是圈内公认的美女，饰李倩君的丫鬟，扮相俏丽，身段灵活，也为戏增色。

从排练到演出，我近距离目睹了老师们对艺术的尊重，对戏的敬畏。不管角色多么小、戏份多么少，他们不迟到、不早退，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不马虎。对情节、唱腔、鼓点的讲究，那真正叫一丝不苟，心中只有一个目标——“精益求精”。

陈伯华老师从不要大牌，一贯对艺术追求完美，认真同鼓师、琴师一起琢磨唱腔，虚心接受导演和老师们的意见。一句唱腔反复几十遍，一种音调斟酌十几遍，从不厌烦。这一代老艺术家，因为汉剧艺术而团结、合作在一起，感情深厚，配合默契，爱护和助力她的每一部作品，让我由衷感动和钦佩。

《墙头马上》演出后连续爆满，那段时间我每天上午照常练功上课，午睡后乘公交车到一元路陈伯华老师家，陪同她乘门口等候的三轮车来剧场。因为她身上从来不带钱，她的母亲、我们称“太太”（奶奶的意思）会给两份零钱，并叮嘱一份是去的车费，一份是回的车费，她接过放进左右两边的裤口袋中，下车时付给师傅。演出后，也会有一位师傅送她回家。

陈伯华老师下午四点前到达剧场，王晓楼、李罗克、胡桂林、周天栋等老师也陆续到达，早早化妆，静静候场，大幕拉开前已进入角色。正是这种精神，《墙头马上》光彩夺人，获得了巨大成功。

王晓楼享受“香葱炒鸡蛋”

有一天演出，王晓楼老师突然唱不准音，用行话说就是黄了不着调，刹那间老师们惊讶地拥到舞台侧幕，我觉得他们比王晓楼老师还紧张。陈伯华老师却是从容镇定，不露声色，一如既往配合着把戏演完。



上下图依次为汉剧表演艺术家
王晓楼、胡桂林、周天栋、李罗克

落幕后，大家询问怎么回事，王晓楼老师说：“我耳朵突然出问题了，我知道该我唱的‘介口’，可就是听不见胡琴的调门。”老师们不由担心，因为不管什么人的耳朵出了问题都非小事，何况是戏曲演员，艺术的表现力——“唱”，是一定要靠听力来指挥的。

陈伯华老师回家后，把此事告诉了她的太太。太太很是着急，她老人家知道二人是多年合作的最佳拍档，马上叮嘱阿姨高价买鸡蛋，并多买一些香葱。

原来，“香葱炒鸡蛋”是治疗耳朵失聪的偏方。从第二天起，太太就要王晓楼老师来家吃午饭，要我也一起到，因此我去过几次。每天，王晓楼老师一边去医院看医生，一边来吃“香葱炒鸡蛋”，在太太“多吃点、多吃点”的关照下，没多久听力果然恢复，又可以参加演出了。

这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看到前辈艺术家那种真挚的情感，他们是同事、是搭档、是朋友、也是亲人。正是这种情感，他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几十年和谐相处，

几十年众星捧月，造就了汉剧的一个鼎盛时期。

陈伯华带我和毛弟外出“做客”

在《墙头马上》剧组，我和毛弟受到众多老师的格外宠爱。尤其是毛弟，李罗克老师教他几个动作，他一下子模仿到位，一出场就受到观众喜爱，成了我们剧组的“开心果”。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老师们口袋里有一点小零食，都会留给毛弟和我（而我已不算小了），陈伯华老师更是如此。有些慰问演出，只是一折或片段，并不需要我俩上场，但她总要把我俩带上，是想让我俩能多吃些好吃的。

一次去武昌山坡机场慰问，部队招待剧组进餐，看到那一大桌子美食，我和毛弟的眼睛都直了。席间，陈伯华老师对首长说：“这是戏中的两个孩子，也是我的两个乖乖，谢谢让他们吃到这么多好东西。”演出结束后，一位兵哥哥送来两大包糖果点心，说是首长送给两个孩子的，陈伯华老师接过，我俩一人一包，别提有多高兴了。陈伯华老师一生没有儿女，但她疼爱我们，同她在一起的日子，我感受到父母一般的爱。



陈伯华、王晓楼演出剧照

排演《墙头马上》，也是我努力学习陈派艺术的大好机会，老师的唱腔、身段、表演，我都一点一滴模仿体会，慢慢融汇到一生的艺术和教学实践之中。

我感恩这一段和陈伯华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胡桂林、周天栋散戏送我回家

《墙头马上》演出期间，还有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就是每晚谢幕之后，胡桂林、周天栋两位老师主动送我回家。

我家住汉口游艺路“老法院”隔壁，两位老师住武胜路荣华村。每次演出结束，等我卸妆换好衣服，两位老师便说：“乖乖，走吗？”走出清芬剧场，六渡桥、铜人像、老会宾一带，沿街有担子叫卖“桂花小汤圆”“桂花赤豆汤”，两位老师就问：“啟凤，吃一碗吧？”在我不好意思中，就有老师掏钱买下，看着我吃完，说：“你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着，送你回家。”

我在前面走，不时回头看看，两位老师便笑：“你放心，不会把你丢下的！”就这样，一直送我家。妈妈出来开门，与两位老师招手再见，他们再回荣华村的家。我不必记得演出过多少场，也不必记得两位老师买过多少次夜宵，但是几十年过去，只要想起这情景，我都会热泪盈眶。两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不辞辛苦，日复一日送一个小学员回家，我是何等的荣幸。听闻胡桂林老师去世那一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大哭了一场，他们的那份慈祥、那份疼爱、那份温暖，我一辈子都会铭记。

俞啟凤，武汉市艺术学校退休教师

从汉口电工器材厂到长江电源厂

◇ 方 宏

因参与编撰有关球场街的街道志，当地有老人告诉我，解放前这里有日本人办的干电厂。何谓干电，难道是干电池？经多方查阅资料，球场街确有一家生产干电池的电池厂，厂房早已不存，但其发展轨迹曲折多变，一段近乎遗忘的工业史浮出水面。

早在抗战期间，一家“中央电工器材厂”从上海内迁武汉，后又辗转迁徙西南大后方，直到抗战胜利返回武汉，接收日产（寇）松下电池厂并改名“汉口电工器材厂”，最终落户武汉。

武汉解放后，“汉口电工器材厂”更名为汉口电池厂，在不久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生产了志愿军所用50%的干电池，有力支援了志愿军保家卫国。70多年来，该厂艰苦奋斗高歌猛进，发展成为我国电池产业的大企业——国营长江电源厂（七五二厂）。

躲避战火由沪迁汉

180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发明了化学电源，人类开始使用电池，电池成为军民通用的必需品。从湿电池到干电池——用石膏固化电解液，使之不会流出而便于运输保管，带来了电池产业的飞跃，因此美国在1890年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1912年，我国第一家电池厂诞生于上海，并逐渐向长江流域扩展，1925年汉口就有了大明电池厂。1930年代，国民政府为了战争需要，也着手开办电池厂，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建设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系统，二是军政部系统，产品主要供国民党军队使用，不在市面出售。据《中国原电池工业史》记载，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在上海半淞园路设立电机制



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营业处的广告橱窗

造厂电池部，开始生产“日月牌”“光明牌”干电池。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电池部于9月下旬西迁汉口，11月中旬在江汉路474号（一栋三层楼房，每层约一百平方米）恢复电池生产，月产A电、B电、单电折合R20（手电池）约6万余只，职工约50人，厂名易为“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第四电池组”（以下简称“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由潘福莹主持。

潘福莹，电化学工程专家，1911年生于浙江嘉兴，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历任中央大学化工系助教、上海电机制造厂电池部主任，中央电工器材厂电池组组长兼工程师。

解放后，潘福莹任国营汉口电池厂厂长，后兼任总工程师，1955年推选为江岸区第一届政协委员。1957年，他作为电池

专家奉命到天津，参与筹建第一机械工业部化学电源研究所并任总工程师，他是中国电池工业的主要开拓者。

一路内迁效力抗战

1938年8月，武汉战事吃紧，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分出一部分员工去重庆，1939年成立重庆分厂。

同时，本部的设备材料共70吨租用货船，从汉口迁往湖南湘潭下摄司。1938年10月武汉沦陷，11月长沙大火，湘潭临近前方甚感威胁，于是分三批南迁广西桂林，厂址设在南门外斗鸡山麓将军桥畔。

从1939年春恢复生产，到1944年搬离，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在桂林历时六载，由于抗战对电池的需求量很大，这一时期是该厂大发展的时期。

1939年1月，由于大后方没有蓄电池厂，飞机电池损坏后无法补充。潘福莹主持研制铅蓄电池并获成功，满足了战时急需，他获得资源委员会嘉奖。

1940年前后，该厂研制出军用特种电池及加水电池，前者系释放地雷之用，后者为战地电话机之用。当时战地采用德国西门子式电话机，加水电池也为西门子特制但供不应求，该厂研制成功加水电池，解决了配套缺口，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1941年，应西北交通机构的邀请，该厂分出一小部分在甘肃设立分厂，“日月牌”干电池得以在抗战大后方大量供应与推广。随着在兰州、桂林、重庆等地设立办事处（所），营业蒸蒸日上，产品也增加了锌锰丙电新型电池等。

1944年日寇进攻广西，该厂内迁贵阳，改名为“中央电工器材厂重庆第四厂贵阳电



解放前后的电池产品

池支厂”，仅能维持小规模生产。蓄电池除供机场轰炸机使用之外，还增加了对炮兵的供应。由于蓄电池可以反复使用，又为盟军赶修飞机所用的蓄电池，几乎成为盟军的修理工厂。

重返武汉接收松下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在上海开设松下电池厂。占领武汉后，日本松下在汉口球场街5—7号开办汉口电池厂，所产电池主供军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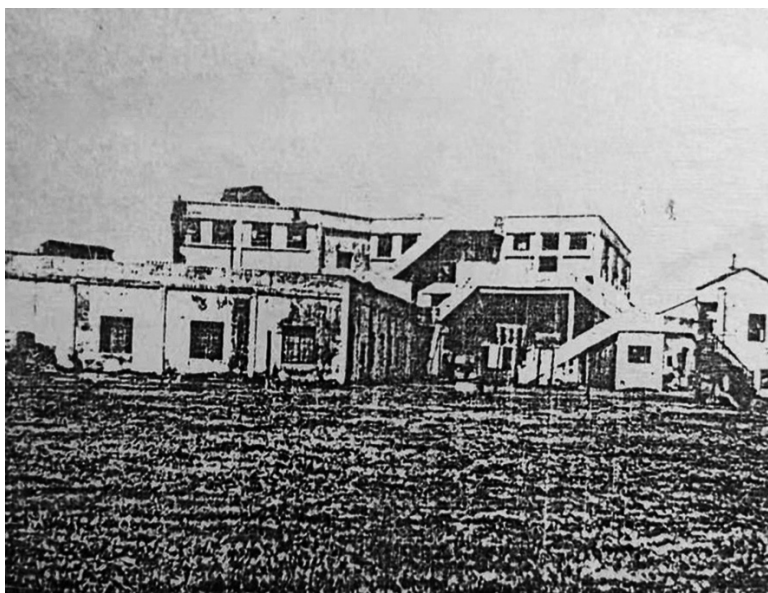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派魏彦章、吴经声等人接管日本松下汉口电池厂，易厂名为“资源委员会

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分厂汉口预备厂”（简称“汉口预备厂”）。

1946年2月，该厂开工生产“日月牌”锌锰干电池。起初一段，主要利用留下的（村井望、宫崎等）139名日本战俘生产，生产情况不佳，一则原半成品不符合我国标准，无法使用形同废物；二则厂房租用英商麦加利银行仓库，蓄电池工场、干电池工场与办公室、材料库、宿舍等混杂拥挤；三则日本战俘心怀异端，所出产品多系粗制滥造。

同年5月，日本战俘回国，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从贵阳迁回武汉，与汉口预备厂合并，先后更名为“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分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电池厂”等，有员工100余人，厂房面积1440平方米。

其时，中央电工器材厂生产电池共有汉口、重庆、天津三个厂，由于大后方设备迁回形成一定规模，武汉又地处交通中枢，汉口厂列为电池制造中心。然而，这段时间生产尚在恢复之中，工商界对“日月牌”干、蓄电池不甚了解，加之美货永备牌电池廉价倾销，产品一度滞销。后经改良品质、改进



解放前位于球场街的厂房

装潢、降低售价，同时加强广告宣传争取客户，到1946年底才逐渐打开销路。

干电池产品主要是电讯用电池、电筒用单节电池等，蓄电池主要是汽车、火车用蓄电池等。蓄电池生产方面，作为湖北省第一个生产蓄电池厂家，虽然产量不大，但质量甚佳，声誉颇高，客户乐用，几乎独占华中市场。

1943年3月，潘福莹经资源委员会层层筛选，成为赴美学习的31人之一。在美学习期间，潘福莹向美国订购了一批自动化机器和相关仪器。干电池方面，有自动打炭

包机、加浆机、戴铜帽机、垫底片机、自动喂料冲床等；蓄电池方面，有自动铸片机等。

1946年底潘福莹学成回国，次年3月被任命为汉口电池厂厂长，由于他吸收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新建了生产线，使该厂干电池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明显的提高。

1947年潘福莹从加拿大购买乙炔黑，在干电池中定量使用，使电池质量有较大提高，这在我国电池业史上也是一大进步，1948年共生产干电池287万支，蓄电池3210万支。

1948年前后，向美国订购的设备陆续运到，投入使用后效率明显提高，电池生产机械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全国同行业少见。

解放前夕，该厂产品皆以军用为主，其它产品主要有：锌锰干电池，用于电话、无线电通信、照明等；铅酸蓄电池主要用于电讯、汽车、火车、矿灯等。“日月牌”锌锰干电池和铅酸蓄电池，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领先地位。

武汉解放重获新生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武汉军管会交通接管部电讯处接管汉口电池厂，改厂名为“汉口电工器材厂”，仅有固定资产12.81万元，职工百余人。接管后，拨款800万元（旧币），稍加整顿于6月15日复工，继续生产“日月



1950年代后的宗关厂区

牌”锌锰干电池和铅酸蓄电池。

不久，潘福莹任命为汉口电工器材厂厂长，后又兼任总工程师。

1957年，潘福莹作为电池专家，奉命到天津参与筹建第一机械工业部化学电源研究所，然后担任总工程师。潘福莹是电化学工程专家，是中国电池工业的主要开拓者。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军用电池的需求量大增，中朝两国所用电池的50%由汉口电工器材厂生产。因此，位于球场街的厂房满足不了需要。1949年9月，选定汉口胜利街276号（原日商三井油厂）废墟为厂址，重新建厂。新址面积15050平方米，除了一座20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以外，其它均被美军飞机所炸毁。1950年二季度动工兴建，实行边生产边建设，1953年全部竣工。

随着生产的发展，胜利街的厂房也满足不了需要，国家二机部1954年决定：将汉口西郊宗关附近的航空工业学校旧址拨给该厂，进行改建扩建。1957年5月，上海无线电厂由沪迁汉，改名汉口无线电厂（今中原无线电厂前身），利用汉口电池厂胜利街厂房和湖北省农机厂的旧址改建，汉口电池厂遂迁往宗关附近新厂区，开始新的征程。

1972年3月，由于汉口电池厂与武汉电池厂在通信等方面经常发生混淆，汉口电池厂改名为“长江电源厂”，同时并用“七五二厂”。



国营长江电源厂生产的部分获奖产品

附录：解放后厂名沿革

1949年：汉口电工器材厂

1953年—1954年：并用汉口电工器材厂、七五二厂

1955年—1956年：七五二厂

1956年—1961年6月：汉口电池厂

1961年7月—1972年2月：并用七五二厂、汉口电池厂

1972年3月：并用长江电源厂、七五二厂

方宏，武汉市政府参事室原特约信息员，民建江岸区会员

“顺丰茶栈”与顺丰砖茶厂关联考

◇ 韩少斌

“顺丰茶栈”2012年列入武汉市第七批优秀历史建筑（一级），据说是当年顺丰砖茶厂留下的唯一一栋建筑实物。这幢四层砖混建筑位于今洞庭街62—64号，外墙水泥拉毛，装饰简洁，第三层临街建有阳台，属西式建筑风格。



“顺丰茶栈”与顺丰砖茶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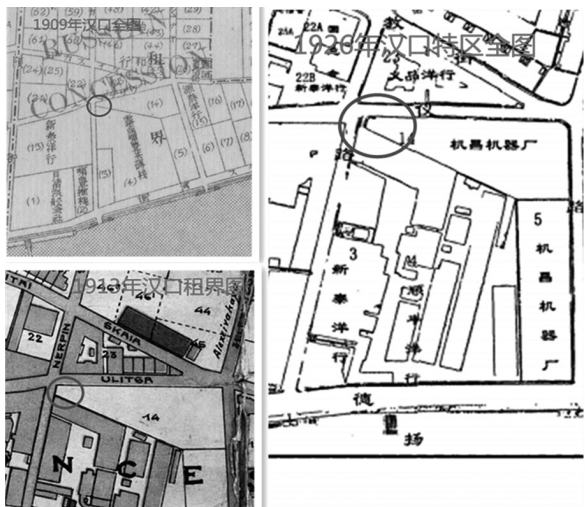
1873年顺丰从鄂南迁汉

提起俄商顺丰洋行，老武汉人并不陌生，今沿江大道靠近南京路口不远的位置，曾是顺丰洋行所在地，它是晚清汉口三大俄国茶厂之一。1871年，顺丰洋行在七码头（今兰陵路口）修建供“汉茶”出口的外运码头，是汉口港首座企业专用码头。

1873年顺丰砖茶厂从鄂南迁建于今黎黄陂路西侧，是武汉最早的近代工业企业，

它所雇佣的近千名茶工，是武汉地区最早的产业工人群体。

美国人罗威廉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年）》一书中指出：“如果不是茶叶贸易，实际上没有一个西方人会涉足这个城市，在西方人眼里，茶叶是汉口存在的唯一理由。”这句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它体现了汉口作为中俄万里茶道节点，在中俄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汉口东方茶港的形成，直接推动了近代武汉的崛起。据《汉口租界志》介绍，以蒲圻（今赤壁）羊楼洞、羊楼司为中心的崇阳、通



1926年汉口特区全图中，“顺丰茶栈”所在的14号地块已标记为德商机昌机器厂

城、通山、咸宁一带盛行种茶，很早就有山西商人来此采购，再运至内蒙古、新疆及俄罗斯。俄国茶商取得清政府贸易许可后，也于1850年前后来汉口，并深入到羊楼洞一带收购茶叶和砖茶，运回西伯利亚等地。

汉口开埠后，俄商顺丰、新泰于1863年和1866年在汉设行，并在羊楼洞设厂“招人包办，监制砖茶”。1873年和1874年，两厂相继迁汉，采用机器压制砖茶。1874年，俄商阜昌砖茶厂在汉口英租界开办。其后，俄国又开设了百昌等几个砖茶厂。

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说：“彼等改良中国压制砖茶旧法，其后改用蒸汽压力机。……初时，制造俄销砖茶之原料为零碎之茶末，后因贸易日渐发展，为商业上之需要，乃将品质良好之茶叶，用机器磨成粉末以制砖茶。”俄商迅速从与英商并立，发展到最后垄断汉口茶叶外销。

20世纪初李凡诺夫接手顺丰

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不全，许多俄商的活动轨迹已不清晰具体。顺丰洋行的创办

者应该是托马可夫等人，后来更换了合伙人为莫洛可夫。20世纪初在汉口负责的李凡诺夫，接手洋行并更改了英文名称。武汉这一首家“外企”，建有几栋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围成方阵，耸立着三座烟囱，购买了最新式的蒸汽机、锅炉和多种制茶机械设备。

“李凡诺夫公馆”位于今洞庭街88号，清水砖外墙，三层砖木结构，属斯拉夫别墅式住宅建筑。1902年起，李凡诺夫一家在此居住。1919年，李凡诺夫全家赴美（也有说他1920年病亡于汉口，其子1938年全家赴美）。据传1997年，曾有李凡诺夫的后代来汉探访时为“别克·乔治酒吧”的原公馆。

不仅如此，从黎黄陂路到车站路、从沿江大道到洞庭街范围内，李凡诺夫拥有大量房地产，1926年《汉口特区（原俄租界）全图》中就标有6个地块，茶叶使其成为汉口租界内有名的富商。现沿江大道163号的一幢古典式建筑，显示为“李凡诺夫夫人”房产，抗战爆发前曾为瑞典驻汉口领事馆。

“十月革命”后顺丰关停

那么“顺丰茶栈”这座建筑，与俄商顺丰砖茶厂有关联吗？



1915年老照片中，“顺丰茶栈”所在地与顺丰砖茶厂院墙阻隔，是一块空地



1931年汉口大水的老照片中，“顺丰茶栈”所在地仍是一块空地

笔者认为证据是不充分的。为此和撰写过《江岸优秀历史建筑》（内部资料）、发现认定新泰茶厂水箱楼的当事人邓伟明及“人文武汉”志愿者孙庆力等几位师友讨论过，也得到方志学者王汗吾的指导。

首先，这个地块可能不属于顺丰砖茶厂范围。现洞庭街62—64号“顺丰茶栈”，位于洞庭街与兰陵路交汇处。在1909年汉口全图和1913年英文汉口租界图中，显示的顺丰砖茶厂范围均未抵洞庭街。这在1926年汉口特区全图中也得到印证，而且标记14号地块已归属德商机昌机器厂（图一）。从1915年左右在巴公房子上拍摄的全景照片长卷中也可看到，“顺丰茶栈”所在地与顺丰砖茶厂是有院墙阻隔的一块空地（图二）。实际上，这座“顺丰茶栈”并不在顺丰所属地块内。

其次，这栋建筑建造年代较晚，顺丰对其不可能有所作为。从1931年汉口大水的一张老照片（图三）中可看到，1930年陈松林投资建设的上海电影院已建成，“顺丰茶栈”仍未见其身影，还是一片空地，可见这栋建筑的年代要晚于这个时期。

众所周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汉口茶叶出口减少，顺丰、阜昌等砖茶厂先后关停。新泰改在英国注册，变成英

商太平砖茶厂。况且，根据《武汉市志》记载，1930年由粤帮商人李煜堂发起，上海永安纱厂、汉帮茂松长、万丰等棉商集资银100万，购进顺丰的厂房和机器，开设穗丰打包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装卸费用较低廉，业务蒸蒸日上，打破了外商对武汉打包业的垄断。1938年被日本侵略军霸占，成为“日本棉花同业工会株式会社”。1945年抗战胜利后，成为军需仓库。同年11月经过穗丰公司交涉，复业打包。1949年武汉解放后，兼营仓栈出租，主要储存中南区花纱布公司的棉花。1955年公私合营，归口武汉市国营商业仓储公司，终止打包业务，转成商品储存，名为“滨江仓库”。可见在这一带，1930年后已无顺丰可控制的产业。

2012年，湖北省文物局发起“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与申遗”倡议。2014年，中俄沿线节点城市达成《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武汉成为万里茶道申遗牵头城市。2020年6月，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正式启动《万里茶道汉口节点申遗与保护管理策略研究课题》项目，通过加强对汉口节点历史脉络的研究，充分挖掘其价值特征、完善其要素体系，有效增强汉口节点价值的说服力和对“万里茶道”整体的支撑度，为正式申遗文本和保护管理规划编制提供基础依据。

此时此刻，对“顺丰茶栈”建筑的认定，就显得犹为重要而应更加谨慎。希望有更确实的资料和知情人来厘清“顺丰茶栈”这座建筑的来龙去脉，不留困惑和遗憾。

韩少斌，武汉奥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理